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信使

2021年第4期

移民的故事

- **尼日利亚移民:**
不惜一切追逐梦想
- **秘鲁:**
气候移民激增
- **海外华人:**
漫长的历史
- **“一次又一次的迁徙,
构成了人类的历史”**
专访伊娃·玛丽亚·盖格尔



ISSN 2096-4064
1 12
9 772096 406219

CTPH 中译出版社
China Translation & Publishing House

 **unesco**

观点

开放科学:
一场促进科学
发现的全球运动

嘉宾

拉丁美洲:
恐龙的黄金时代 ▪ 专访古生物学家
米丽娅姆·佩雷斯·德洛斯·里奥斯



订阅印刷版本

144元/年 (共4期) 288元/两年 (共8期)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

厦 6 层中译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8359101 邮编: 100044

<https://zh.unesco.org/courier/subscribe>

免费订阅电子版本



关注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信使》
微信公众平台



阅读并分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根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开放获取出版政
策, 积极鼓励其传播和使用。

2021 年第 4 期 1948 年创刊

《信使》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出版, 季刊, 旨在通过分享对国际相关事务的观点来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愿景。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信使》出版作出资助。

主 管: 马蒂厄·盖维尔

代理主编: 阿涅丝·巴尔东

副 主 编: 卡特琳娜·马尔可洛娃

责任编辑: 陈晓蓉

编辑顾问: 珍妮·戴尔

编 辑:

- 阿拉伯语: 法特西·本·哈吉·亚西亚
- 中文: 孙敏, 中译出版社有限公司
- 英语: 习拉兹·西德瓦
- 法语: 克里斯汀·赫尔姆 (校对)
- 俄语: 玛丽娜·雅尔采娃
- 西班牙语: 劳拉·贝尔德霍

数字编辑: 米拉·伊布拉欣莫娃, 琳达·克拉森

图片编辑: 达尼卡·比耶利亚茨

翻译与排版助理: 玛丽-特蕾莎·维迪亚尼

行政及编辑助理: 卡洛丽娜·罗兰·奥尔特加

制作与推广: 伊恩·丹尼森 (UNESCO 品牌与出版总监)
埃里克·弗罗格 (高级制作助理)

网页设计: 丹尼斯·皮扎利斯

联络: 蕾蒂西亚·凯西

翻译 (中文): 中国对外翻译有限公司

设计: 杰奎琳·根索伦 - 布洛赫

封面插图: © Agnieszka Ziemiszewska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 UNESCO

实习生: 李宜洪, 朱曼青 (中国)

合作出版版本:

- 韩 语: 宋美金
- 加泰罗尼亚语: 让 - 米歇尔·阿门戈尔
- 葡萄牙语: 伊万·索萨·罗查
- 世界 语: 陈吉

咨询与版权问题: courier@unesco.org
7, place de Fontenoy, 75352 Paris 07 SP, France
© UNESCO 2021



使用条款: 本刊经“署名 - 相同方式共享 3.0 国际政府组织 (CC-BY-SA 3.0 IGO)”授权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igo/>) 可开放获取。若引用该期刊内容, 需接受并遵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放获取资料库的使用条款 (<https://zh.unesco.org/open-access/terms-use-ccbysa-chi>)。

现授权限仅为文字内容, 若使用图片, 需事先申请许可。

期刊所载内容若涉及任何国家、领土、城市或地区当局的合法地位, 以及涉及边界界定, 皆不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观点。

所刊文章为作者观点, 未必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观点, 本组织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主管单位: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单位: 中译出版社有限公司

总 编 辑: 乔卫兵

执行主编: 刘永淳

编辑部主任: 刘香玲

责任编辑: 王秋璿

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 6 层 100044

电 话: (010) 68359101 (发行部)

68359719 (编辑部)

邮 箱: huangli@ctph.com.cn

国内总发行: 北京市邮政局

国外发行: 中国图书进出口 (集团) 总公司

电 话: 0086 10 64258884

邮 箱: export@cnpic.com.cn

国内统一刊号: CN 10-1517/C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2096-4064

国际标准刊号 (电子版): e-ISSN 2220-3583

定 价: 36.00 元

目录

2

广角

移民的故事

- 尼日利亚移民：不惜一切追逐梦想** 5
兰雷·伊库特伊霍
- 难民：克服偏见** 8
亚历山大·贝茨
- 秘鲁：气候移民激增** 12
劳拉·贝尔德霍
- 加拿大：流亡伤痛的治疗中心** 15
盖伊·萨布林
- 智能手机：流亡路上离不开的指南针** 18
莫哈·恩纳吉
- 维内拉·托克托洛娃：一位吉尔吉斯移民的发达之路** 20
纳齐古尔·朱苏波娃
- 海外华人：漫长的历史** 22
庄国土
- 牙齿：过往人类流动的缩影** 25
珍妮·戴尔
- 伊娃·玛丽亚·盖格尔：“一次又一次的迁徙，构成了人类的历史”** 26
阿涅丝·巴尔东 担任采访

28

影像

- 多米尼克·罗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了我整个世界”** 28
摄影：多米尼克·罗杰 文字：卡特琳娜·马尔可洛娃

38

观点

- 开放科学：一场促进科学发现的全球运动** 39
谢里法·布卡塞姆-泽格穆里
- 同行评审：让科学评估更透明** 42
亚历克斯·霍尔科姆

44

嘉宾

- 拉丁美洲：恐龙的黄金时代** 44
米丽娅姆·佩雷斯-德洛斯·里奥斯 接受采访
劳拉·贝尔德霍 担任采访

48

深度阅读

- 记者：一份高危职业** 48

因战争被迫背井离乡的家庭，城郊搭起的临时营地，还有冒险渡海死里逃生的幸存者……当今世界，移民总是沦为不幸的代名词，且新闻报道已惯于为他们塑造卑微的形象。这些新闻反映的情况并不虚假，目前试图逃离阿富汗的平民正在经历的确实是这般光景。

然而，作为 21 世纪的一大重要现象，移民问题复杂、多元又多变，仅是悲剧的一面远远无法涵盖这些特性。根据国际移民组织（IOM）2020 年的估计，全球共有 2.72 亿国际移民，这些人离开祖国的原因既包括逃离暴力、自然灾害或者气候变化的影响，也包括想要在其他地方学习、工作、创造新的生活。

全球国际移民的总数仍在持续上升，有人将其当作政治武器频频加以利用，想让人们相信移民构成了真实的威胁——事实并非如此，移民只是方便东道国掩盖恐惧感和挫败感的替罪羊。疫情期间，这种恐惧感愈演愈烈，其中一大原因就是移民的偏见，人们因此忽视了既有的数据，特别是以下两项：实际上人口流动主要发生在低收入与中等收入国家之间，且几乎半数的移民是在本国境内流动。

偏见也助长了针对新移民的排斥、种族主义，甚至歧视。妇女的处境尤为不利。正是为了鼓励和和睦共处、减少诸如此类的歧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了国际包容和可持续城市联盟（ICCAR）。

该组织还致力于提醒我们，在枯燥单调的统计数据背后，有千万种人类命运，衍生出无数虽时有酸楚、但欢欣常在的故事，如此丰富的文化大融合，是我们的生活和集体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身处一个全球化的社会，交流和旅行日益频繁，许多人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以“向别处去”，那么“移民”一词还有什么意义呢？

海地作家勒内·德佩斯特（René Depestre）在《交叉职业》（*Le Métier à métriser*）一书中邀请我们共同思考“流亡”一词的概念：“过去认为，人们必须足不出户，在家里闻着祖母煮的咖啡的香气，才算是拥有身份认同。但在今天，全球化进程向我们发出呼吁，这种观念已经过时了，应当摒弃。”

移民的故事



《无题》(七), 多联画的一部分, 2006年© Anabell Guerrero

▼“世界之声 / 迁移”系列作品, 由委内瑞拉裔法国艺术家阿纳贝尔·格雷罗 (Anabell Guerrero) 于 2006 年创作, 其中, 面部和手部细节是唯一可以识别身份的部分。

阿涅丝·巴尔东 (Agnès Bardón)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20年，国际移民人数多年来的增长趋势首次放缓。造成这种轻微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有关的流动限制；在此前的几十年里，移民流动始终在稳步增长。2020年，有2.81亿人生活在出生国以外的国家。2000年这一数字为1.73亿，而1970年仅为8400万。

无论以往还是现在，人们离开祖国都是为了摆脱贫困，过上自己心目中更美好的生活。移民往往离开家人，独自去探寻新的未来。多年来逐渐形成的几条主要移民走廊，如今依然是由发展中国家通往工业化国家——美国、欧洲、俄罗斯联邦和沙特阿拉伯。

越来越多的人为了逃避冲突和暴力而背井离乡。2020年，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占移民总数的12%，而20年前的这一比例为9.5%。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数据显示，因战争、危机、受迫害而被迫流亡的人数在2000年至2020年的20年间翻了一番，从1700万增加到3400万。气候变化的影响（包括缺水、土地贫瘠和海岸侵蚀）也导致更多人逃离家园。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联合国在2018年通过了《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旨在改善跨国移民的境况，鼓励各方在移民领域开展合作。该契约还强调各国应为踏上危险路线的移民提供援助。

许多移民会陷入遭受剥削、敲诈勒索和暴力侵害的困境，尤其是那些被人贩子所掌控的非法移民。一些人会在这样的旅途中失去性命。仅2021年第一季度就有1146人在试图穿越地中海时死在海上。

对活着到达旅途终点的人来说，东道国的实际情况往往与他们的梦想生活相去甚远，许多移民会遭受偏见甚至歧视。在经济环境恶化、不确定性突出的情况下，外来人口有时会被视为威胁，从而加剧民众的忧惧和挫折感。

人们总是忘记，现实情况会比表象更加复杂和微妙。移民人数看似惊人，其实仅占全球人口的3.5%——远远达不到某些人所谓的“移民狂潮”。不仅如此，绝大多数移民的流动仅限于同一片大陆。2020年，有将近半数的跨国移民居住在原籍地区。



如何报道移民： 记者和教育工作者指导手册

在当今媒体报道中，关于移民和被迫流离失所者的话题是最具挑战性的，记者和新闻机构有时甚至不愿触碰这些复杂而敏感的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21年出版了一本手册，名为《关于移民和难民的报道：新闻教育工作者手册》，帮助新闻教育工作者处理相关事宜。该手册提供了大量可公开获取的资源，其中包括理论和对全球案例研究的分析，以促进人们更好地理解移民问题，鼓励更兼顾各方、更知情的公开讨论。

该手册由一个涵盖媒体研究人员、教育工作者和从业人员的国际小组编写，共13个模块，为新闻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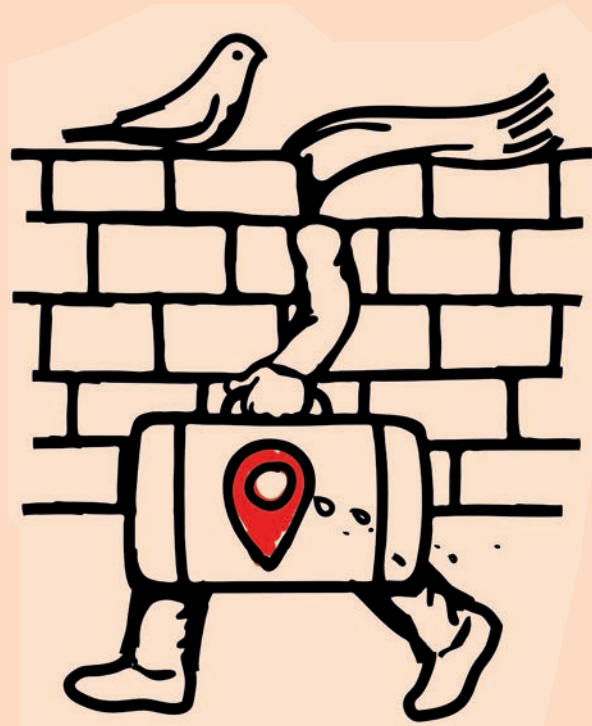
育工作者提供了一套全面的课程。课程内容包括关键术语、背景、专业挑战、最佳做法、创伤处理（除了移民和难民的创伤，也包括报道记者的创伤）、跨境合作，以及移民与难民故事的讲述方式。

通过该手册，新闻专业的学生将认识到，移民故事首先是人的故事，需要合乎道德的报道、准确的事实和可靠的消息来源。从业记者也可利用该手册，从而提高报道质量，并解决报道移民时自身面临的问题。

人们还忽视了，人口流动一直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在作为起源地的非洲以外，已知最古老的人类或前人类遗迹可以追溯到 200 多万年前。

而最重要的是，我们通常不会意识到，透过枯燥乏味的统计数字，总是可以看到人类的命运和生活经历——有时起伏跌宕，但多半欢快惬意。正是在多种文化相互交融碰撞的过程中，结出了商业、体育、音乐和科学研究领域的累累硕果。

从长远来看，移民的贡献往往是东道国社会的一项资产。说这句话的并不是非政府组织。欧洲委员会在 2017 年的报告《移民，欧洲发展的机遇》中指出：“移民为欧洲国家带来了多样性，促进了文化交流，对艺术、体育、时尚、媒体和烹饪产生了重要影响。” ■



©Alireza Tabouk, 为明日而生海报, 2017年

▼《行动自由是一项人权》，由伊朗平面艺术家阿里雷萨·塔布克 (Alireza Tabouk) 创作。

以数字展现的全球移民状况

2.72 亿

2019年全球范围内的
国际移民人数

占世界人口的3.5%

其中52%是男性

国际移民的
主要来源国：

- 印度：1750万
- 墨西哥：1180万
- 中国：1070万

国际移民的主要目的国：美国



2590 万

2018年全球难民人数

4130 万

各国因暴力和冲突而流离失所的人口总数（截至2020年年底）

6890亿美元

2018年国际汇款总额

汇款收入最高的国家：

- 印度：786 亿美元
- 中国：674 亿美元
- 墨西哥：357 亿美元

对外汇款最多的国家：

- 美国：680亿美元
-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444亿美元
- 沙特阿拉伯：361亿美元



资料来源：《2020年世界移民报告》，国际移民组织。

尼日利亚移民： 不惜一切 追逐梦想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尼日利亚年轻人选择离开祖国，远走他乡？不断攀升的失业率、机会匮乏、理想化西方世界产生的吸引力，以及对于非法移民的种种危险懵然不知，所有这些都促成了大批青年的出走。

兰雷·伊库特伊霍 (Lanre Ikuteyijo)

尼日利亚欧巴费米·阿沃罗沃大学（伊莱伊费）社会学和人类学系高级讲师。

尼日利亚青年是从全球南方国家跋山涉水前往欧洲的最主要移民人口群体之一。这些年轻人为什么决定离开祖国，远走他乡？他们是否知道途中可能遭遇的危险？为解答这些问题，我在2019年发表了研究报告《作为生存策略的非正常移民：尼日利亚城市青年的叙述》。

我选择了尼日利亚国内四个主要城市——拉各斯、伊巴丹、伊莱伊费和贝宁市作为研究地点，它们都有着与非正常移民相关的特性，研究重点

是15岁至35岁的群体。所有接受采访者都有可能进行非正常移民——这些人要么失业，要么即将完成高等教育，要么参加了义务性的“国家青年服务团”。

陷入上述一种或几种境况的年轻人表达了对于未来的忧虑，他们将移民视为一种生存策略，希望借此摆脱贫困和无能为力的状态。研究对象还包括离开尼日利亚之后又回国的青年——其中有些人是自愿的，有些人是被驱逐出境的。

“
2020年，有53.4%
的尼日利亚年
轻人失业。”

我的第一个研究发现是，大多数青年都不熟悉正规合法的移民程序。他们当中半数以上的人没有有效的护照，而持有护照是进行安全合法的移民的一项基本要求。与此同时，他们却知道可以通过非法途径移民，就像尼日利亚人常说的，“沿着公路去欧洲”。很多人身边都有走非法渠道离开尼日利亚的真实例子，有些用了伪造的旅行证件，有些则靠人贩子或走私贩帮忙。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这些人的普遍共识。大多数青年认为非正常移民并不是犯罪，而是一种“灵活变通”或“高明”的实际出路。这些人的移民意愿十分强烈，说明他们还不了解非法旅途上的种种风险，很容易沦为人口贩运集团的猎物。



© Osama Hajjaj / 卡通运动

▼ 《移民欧洲的非洲人》，由约旦漫画家乌萨马·哈贾杰 (Osama Hajjaj) 为总部设在荷兰的全球时政漫画平台卡通运动 (Cartoon Movement) 创作。

对于国外生活的理想化憧憬

移民计划的核心往往是“想象中的西方”，这是对西方生活的理想化臆测。受访者普遍认为，成功移民的人可以享受到更好的生活。“那些移民国外的人总是生活得比我们这些呆在尼日利

亚的人要好得多。他们那里电力供应稳定，天气好，吃得好，而且比较安全。”29岁的失业妇女萨特戴*这样说。

广播、电视、音乐，以及其他流行文化和媒体对于目的地国家的种种描述也影响到了这些人的态度。曾经到访其他大陆，特别是欧洲和美洲的人喜欢说自己“去过”，这种说法提

升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回国的移民前来参加聚会，被人们视为增光添彩的喜事。

关于目的地国家的信息来自亲友和社交媒体等非正式渠道，往往有所夸大或不够准确。

非洲：以说唱警示非正规移民的危险

《警告》(Warned)是为纪念2020年12月18日国际移民日而发布的说唱歌曲，其视频在塞内加尔广为流传。在这首歌中，说唱歌手徐曼(Xuman)警告嘻哈艺术家玛米·维捷(Mamy Victory):踏上非正规的移民之路危险重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西非和中非开展了名为“通过媒体和通信增强非洲青年权能”的提高认识的活动，这段视频正是该项目的一部分。活动旨在向年轻人提供公正而全面的信息，包括与移民有关的问题，以及移民在新冠肺炎大流行环境下面临着怎样的歧视。

这场活动为期两周，已通过社交网络和当地媒体在8个国家(喀麦隆、科特迪瓦、加纳、几内亚-科纳克里、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转播视频、动画片和视听讯息。除法语和英语版本以外，这些媒体资料还被制作成20种官方和国家语言(包括鲍勒语、芳蒂语、马林凯语、约鲁巴语和沃洛夫语)版本。

这些视频展示了2020年10月和11月分别在塞内加尔达喀尔、尼日尔尼亚美举办的两次写作讲习班的成果。讲习班以移民为主题，与Africulturban塞内加尔文化协会和尼日尔“全球行动论坛”进行合作，吸引了广大记者、专家、艺术家和移民人士参加。在开展活动的15天期间，数字平台上的观看量总计近600万次，互动量总计达到30万次。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视频《阻止》(Prévenue)的其中一个镜头，由说唱歌手徐曼和玛米·维捷拍摄，警告人们踏上非法移民之路危险重重。该片段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达喀尔的YouTube主页上播放量已达23.5万次。

地方性失业

尼日利亚的经济状况和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率，促使人们寻求更好的机会、工作和保障。2020年，尼日利亚国家统计局报告有53.4%的年轻人失业。“世界贫困时钟”2021年数据显示，约8600万尼日利亚人（占人口的41%）正生活在极端贫困中。

由于经济现状如此，再加上政治不稳定、冲突浪潮升级等其他因素，现在又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某些类型的青年离开尼日利亚，前往在他们心目中更有前途的国家。

“
大多数青年并不认为非正常移民是犯罪，而是一种‘高明’的实际出路。

通过非法渠道离开尼日利亚的大多数受访者表示，他们对于前途茫然无知。许多返乡者讲述了自己在前往欧洲途中遭遇的可怕经历。30岁的杰西卡是从意大利回来的，她说与她一同上路的6个姑娘死在了海上。160名女孩被装进三艘船，其中两艘在航行途中出现机械故障，有6个女孩在船只获救之前已经死亡。她们的船最终停靠在西班牙马德里，幸存下来的女孩被潜在的主顾和雇主（无论非法与否）接走了。

一国的国力增长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国人力资本的发展，这往往体现在培训和教育方面。在尼日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我必须追本溯源》，由达米安·格莱兹（Damien Glez）于2020年创作，这位布基纳法索裔法国漫画家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媒体和通信增强非洲青年的权能”活动创作了十幅作品，该画作为其中之一。

利亚的公立教育系统里，教师和相关教育工作者时常发起劳工运动，导致人们对教育机构丧失信心，也致使教育中断。为此，年轻人希望出国寻找学习机会。

让青年了解非法移民

这种情况往往导致递进式的移民。为过上更好的生活，大多数学生在完成学业之后不愿回国，而是希望留在目的地国家寻求个人发展机遇。杰西卡就是一名尼日利亚学生，她受到人贩子的引诱，后者向她承诺在国外上学不会受到任何打扰。“在中学第一个学期的假期里，家里的一位朋友告诉我父母，可以带我去意大利继续上学。我的父母同意了，因为他们认为在意大利，我的学业不会受到干扰。”杰西卡后来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了，于是回到了家乡。

了解了尼日利亚青年倾向于移民的这些原因，或许就可以找到政策解

决方案。尼日利亚必须消除不平等，创造就业机会，为民众提供安全保障，只有这样才能留住年轻人。政府应该通过多种方案和活动，让青年了解非正常移民的危险和陷阱，如实还原非正常移民者的真实生活，揭示目的地国家的实际生活状况。中学课程应包含关于移民权利和国际移民程序的知识。

尼日利亚必须促进和发展善待青年的经济，为有上进心的年轻人提供必要的财政和实际支持。要确保国家能够留住青年群体中蕴含的丰富技能和能力，所有这些干预措施都至关重要。 ■

*为保护研究参与者的身份，所有人名均为化名。

人们对非洲难民普遍存在一些先入为主的看法，比如认为他们全都有前往欧洲、北美或是澳大拉西亚的打算，比如东道国社会向来敌视外来移民，又比如难民势必会与东道国公民争夺本已稀缺的工作机会。研究表明，这些观点大部分是错误的。

难民：克服偏见

亚历山大·贝茨 (Alexander Betts)

英国牛津大学被迫迁徙和国际事务教授。

当今世界有 8240 多万人因为遭遇迫害、军事冲突和其他危机而流离失所，其中包括 2600 万逃亡国外的难民，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有过的严峻情况。然而，在庇护和移民问题日益政治化的背景下，不管是富裕国家还是贫穷国家的难民都越来越难得到国际社会的保护。造成问题的部分原因是虚假消息。媒体和政客将难民描述成东道社区无法摆脱的负担，这有时会扭曲公众的认知。

我的近著《难民的财富：流离失所者的经济建设之道》(*The Wealth of Refugees: How Displaced People Can Build Economies*) 于 2021 年出版，我在书中主张采用循证的方法来制定难民政策。根据在东非开展的广泛的定性和定量研究——其中一项是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乌干达的难民营及城市中 16000 多名难民和东道社区居民开展的原始调查——我提出假如能够实施包容性政策，难民就有可能成为并被视为东道社区的贡献者。我进行研究的目的是，消除关于非洲难民的五个常见误区。

流动性： “所有非洲难民都将涌入欧洲”

富裕国家的民众普遍认为所有难民都想去欧洲、北美或是澳大拉西亚。但难民的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中低收入国家接收了 86% 的难民，且主要的难民国十有八九都属于南半球。

诚然，移居富裕国家的强烈愿望是存在的。但许多人也承认，这种想法并不现实。例如在亚的斯亚贝巴，超过 95% 的难民希望前往第三国，但其中半数以上的人都明白这在近期内大概无法实现。

在肯尼亚，有大批难民会在一年当中改变居住地点，但这种流动基本局限在国内。出境的难民大多数是前往东非邻国乌干达，或是通过归国或重新安置等有组织的迁移安排完成跨境流动。只有极少部分难民（平均每年远低于 1%）实现了前往欧洲或其他富裕国家的跨区域流动。

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认识到大多数难民不仅现在，而且今后仍将由他们所在地周边的中低收入国家接纳。

社会凝聚力： “东道社区必然敌视外来难民”

人们普遍认为，东道社区必然会将难民视为一种负担。其实，若政策得当，人们有时会以积极的态度面对难民。在一些偏远的边境地区，难民和人道主义组织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增加工作岗位和形成市场的途径。例如，对肯尼亚的图尔卡纳社区来说，设在当地的卡库马难民营为社区居民的木柴和牲畜提供了市场，创造了就业机会，并且让学校和诊所以得以建立起来。

在几个作为研究重点的国家，我们发现东道社区最看重的是经济互动的质量。因难民的出现而获得经济利益的人对于难民的态度往往也是最积极的。我们还注意到，相互接触可以起到很大作用——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水平越高，东道社区的态度也就越积极，二者相辅相成，这种情况在城市尤为显著。此外，大多数人都会与家人和邻居保持统一，用相似的态度对待难民，可见这种态度是在小圈子里形成的。

这就意味着，东道社区可能会欢迎难民的到来，并且可以采取一些政策来促进包容。简而言之，难民政策



▼一位来自图尔卡纳的妇女（左）和她来自南苏丹的难民朋友，摄于肯尼亚西北部的卡洛贝耶伊综合安置点。

也应为东道社区提供支持，帮助建立起难民和东道主之间的友好关系。

工作权： “东道国会因允许难民 就业而蒙受损失”

国际难民法和人权法规定，难民享有社会经济权利，其中就包括工作权和行动自由。然而，收容难民的许多国家却认为允许难民就业会导致他们与东道社区之间关系紧张，从而对这些权利横加限制。结果，身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等国的难民不得不在难民营中滞留多年，始终得不到就业机会。证据表明，这种做法不仅损害了难民的权利和福祉，还可能对东道国造成负面影响。

在非洲，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允许难民就业和自主选择居住地，乌干达就是其中之一，这种做法为难民带来了许多好处。乌干达境内的难民收入比邻国肯尼亚境内的难民高出 16%。

一些证据表明，上述政策惠及的不仅是难民，更有东道国的公民。例如，我们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发现，约有 21% 的难民家庭经营着一家至少有一名雇员的企业，而这些雇员当中有 40% 是乌干达本国人。许多乌干达人认为，难民作为生产者、消费者和企业主为经济作出了贡献。

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积极促进难民的工作权利和就业机会并给予激励，无论他们身处何方。

城市与难民营： “难民在城市里一定比 在难民营里过得更好”

大多数难民目前都生活在城市里，广泛的全球城市化趋势由此可见一斑。然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况并非如此，当地绝大多数登记在册的难民都生活在类似难民营的环境里。负责难民事务的联合国机构——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显示，肯尼亚难民只有 16%

移民、难民还是流离失所者？

移民：在国际层面上，“移民”一词没有法律认可的定义。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称，移民是指“所有在一国之内或跨越国际边界离开常居地的人，无论其法律地位为何；无论这种迁徙是否出于自愿；无论这种迁徙是出于何种原因；亦无论其居留时间长短”。此外，这个群体往往还包括某些类别的短期移民，例如，在种植季或收获季迁徙的季节性农业工人。

难民：根据 1951 年《日内瓦公约》中的定义，“难民”一词适用于“所有畏惧因种族、宗教、国籍、属于特定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等原因受到迫害，从而离开祖国……且不能或者由于上述畏惧不愿返回该国的人”。

流离失所者：这些人被强迫或是出于迫不得已的原因从原有家园或惯常居所逃走、离开，具体来说，就是为了逃避武装冲突、普遍暴力、侵犯人权行为或天灾人祸。这一定义适用于各国境内及跨国的流离失所者。

寻求庇护者：寻求国际保护的个人。据联合国难民机构联合国难民署（UNHCR）称，该术语用于定义“庇护申请尚未得到处理的人”。

资料来源：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移民词汇表》



© 联合国难民署 / Samuel Orieno

▼ 24岁的毛比·萨米尔 (Maombi Samil) 是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难民，他在肯尼亚卡库马难民营的小工厂里制作口罩。

住在首都内罗毕，乌干达难民只有 6% 住在首都坎帕拉，埃塞俄比亚难民只有 4% 生活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这种城乡分布模式反映出政府的限制措施、援助与就业的相对可得性，以及难民的某些偏好。

生活在城市和难民营中的群体构成通常是不同的。年长者和男性往往住在城市，年轻人和女性则住在难民

营。有些难民家庭可能会各奔东西，有工作能力的人迁往城市，需要援助或负责照料的人则留在难民营。

我们在东非的研究有三个重大发现。第一，生活在城市里的难民挣得更多，拥有更多，工作机会也更多；但与生活在类似难民营环境里的人相比，这部分人未必更快乐、更健康，或吃得更好。第二，农村东道社区对于难

民的态度通常比城市社区的态度更加积极。第三，在难民营和城市之间存在临时和永久性的双向流动。

这就意味着，对于难民来说，居住在城市或农村本质上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这两种选择都受到一定限制，各有好坏。难民政策应该着眼于在城市和农村两种环境下帮助难民获得更多权利。



移民身份的诺贝尔奖得主 彬彬济济



自 1969 年增设经济学奖以来，大部分诺贝尔奖都被美国的机构收入囊中。然而，从事这类前沿研究的科学家们往往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外籍人士。根据诺贝尔奖基金会提供的数据，在 281 名就职于这些美国机构的获奖者中，有 87 人出生在美国以外。

其他国家也呈现出这种趋势。自 1969 年以来，45 位代表英国机构的获奖者中有 15 人生于国外。而在瑞士，外籍获奖者的数量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与本土获奖者的比例达到 8 : 7。日本和瑞典的机构在获奖数量上均排名世界前十，但这两个国家没有依靠移民科学家的帮助，它们分别有 15 名和 8 名本土获奖者。

诺贝尔奖得主之中移民和侨民占比高的原因主要在于各个研究机构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根据 2021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报告》，二十国集团成员国的研究人员占全球研究人员总数的近 89%（以专职同等资历计）。

其中，欧洲联盟（23.5%）、中国（21.1%）和美国（16.2%）所占比例最高。在某些情况下，研究人员数量比研究经费增长更快，以致发生项目资金短缺。这可能会导致人才流失。

助问题有着复杂且往往模糊的政治背景。

即便是那些最进步和最慷慨的难民收容国，我们在分析其动机时也可以明显看到难民权利背后的政治意图。例如，乌干达广受赞誉的自力更生政策，需要结合该国的历史或政治背景去理解。这项政策由来已久，是在历届总统的支持下逐步形成的，绝非最近的创举。

这就意味着，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应该了解难民保护工作的政治背景。要在不同国家促进难民的权利，不能仅仅靠宣传，而是需要采用不同的工作策略和激励方法。 ■

“中低收入国家接收了 86% 的难民。”

政治： “援助难民仅仅是出于人道主义”

保护和援助难民经常被视作纯粹的人道主义行动。诚然，国际法和宣传工作在促进难民保护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我们同样必须认识到，难民援

秘鲁的海岸线长度超过 3000 千米，生态系统极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是人口流动与自然事件高度相关的典型国家之一。

秘鲁：气候移民激增

劳拉·贝尔德霍 (Laura Berdej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境内流离失所问题监测中心 (IDMC) 的数据显示，2008 年至 2019 年，秘鲁 3300 万人口中约有 65.6 万人因遭受自然灾害而被迫迁移。经预测，由于环境危害将日益频繁和剧烈，估计到 2100 年这种迁移会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利马电视台的女摄像师利利亚娜·马克斯 (Liliana Márquez) 告诉我们：“关键词是 ‘huaico’ —— 我们用它来指代厄尔尼诺现象中暴雨带来的山洪，这种灾难几乎每年夏天都会发生。同样的情况在秘鲁不断重演，我们国家第一次与气候有关的人口大迁移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当时扎尼亚河泛滥，整座城市被迫搬迁。”

厄尔尼诺南方涛动 (ENSO) 是导致秘鲁自然气候变化的最重要因素，其特点是太平洋表层海水温度变暖 (厄尔尼诺事件) 和变冷 (拉尼娜事件)，该现象引发的大气变化将严重影响到气候，特别是降雨模式。

秘鲁沿海地区上一次发生厄尔尼诺现象是在 2017 年，致使将近 30 万人流离失所。除厄尔尼诺之外，秘鲁的



© Benjamin Morales Armao

三大生态系统都面临着特定风险，均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移民潮。

自然风险加剧

秘鲁的大部分人口和经济活动都集中在沿海地区（costa），当地居民饱受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现象之苦，同时还承受着频繁的干旱、无雨期，以及间或出现的高温和极端气温、森林火灾和强风。

高原地区（sierra）的大部分气象灾害都与水有关，但也不乏高温酷热的情况。库斯科等地笼罩在极寒当中，气温降到冰点以下。这里最大的危险之一是冰川消融，消融一旦加速，可能导致高原地区28%的居民迁移，同时还会威胁到秘鲁的主要水源。

最后，热带雨林地区（selva）的大规模洪水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出现了严重干旱、河岸坍塌、水土流失、森林滥伐和极端热应力风险等现象。

秘鲁的贫困率已经超过20%，而疫情又严重加剧了各种社会不平等，

在这样的情况下，诸多环境威胁导致秘鲁民众的社会经济脆弱性尤为显著。

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PIK）和国际移民组织在2021年对秘鲁进行了一次评估，发现秘鲁有一半的国土存在经常性危害，三分之一的人口处于高风险空间，其中900多万人易受暴雨、洪水、山洪和滑坡影响，700万人面临低温和极低温的威胁，将近350万人可能遭遇干旱。

按照最坏的估计，到2100年全球升温将超过4摄氏度，这个地处安第斯山区的国家届时将面临三重严重威胁，可能导致数以万计的人口流离失所——亚马逊地区出现极端热应力，安第斯山脉的冰川几乎完全融化，以及发生更强烈的厄尔尼诺事件（将危及沿海民众）。

境内流离失所

迁移现象在秘鲁由来已久，人们会长期或临时进行境内迁移，或前往他国。入境者历来少于出境者，人们离开祖

国是为了改善工作前景，争取机会参与社会生活和接受教育，同时，为了躲避环境危害而迁移的人数也在不断增长。国际移民组织指出：“历史上的这些人口流动在全国各地形成了通畅的迁移网络，向城市和沿海输送新移民，也让更多汇款流向农村地区。”

气候移民主要在国内流动，其动态情况取决于社会人口因素——第一是年龄，年轻人迁移更加频繁；第二是贫困，穷人迁移的可能性更高；第三是性别，男性迁移的可能性略高于女性。

秘鲁人居住的这片土地有着极端的地貌和气候，为应对身边的种种危害，秘鲁人已经掌握了应对和适应策略。厄尔尼诺南方涛动决定了可捕获的海洋资源的增加和减少，渔民便遵循其中的规律沿海岸线移动；北部皮乌拉省的农民也会在旱季临时迁移，以实现收入多样化。

在高原地区，寒潮、严寒天气、冰川消融造成的水资源短缺和降雨模式变化曾经导致大规模人口流动，如今，这种流动正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加速进行。在热带雨林地区，农民将



© 绿色和平/Daniel Beltra

▼ 科迪勒拉布兰卡山脉的亚纳马里冰川（Yanamarey），分别摄于1997年（左）和2004年（右）。图像显示，冰川面积在短短7年内明显缩小。

迁移作为雨季的临时性预防措施，以缓解粮食匮乏问题。

很多移民别无选择，只能在同样面临多重危险的地区重新安家，例如河床、河漫滩和城市郊区缺水的山丘。国际移民组织指出：“灾难引发的流离失所会导致民众丧失生计和财产，包括住房和其他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的社会心理创伤。”

面对这种情况，媒体在气候引发的流离失所的管理工作中所起的作用日益重要。马克斯说：“2017年山洪的受害者三年后还住在利马的帐篷里。”国际移民组织中美洲、北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办事处移民、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区域专家巴勃罗·埃斯克里瓦诺（Pablo Escribano）注意到：“人们越来越关注气候迁移背后的那些人故事。”

埃斯克里瓦诺说：“这些故事很有意义，观众能够由此走近受到气候变化影响和被迫迁移的人们，了解他们的实际境况。”

全球现象

除了秘鲁，孟加拉国、斐济、加纳和坦桑尼亚等国的气候迁移规模也在扩大，这些都是全球趋势的一部分。联合国难民署2021年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过去十年中，因天气事件流离失所的人数平均每年新增2150万，是因冲突和暴力流离失所人数的两倍有余。

境内流离失所问题监测中心2021年的报告显示，2020年，地球物理灾害和气象灾害导致全球共3070万人无家可归。在灾害引发的流离失所情况中，以气象事件为起因的有98%。

监测中心主任亚历山德拉·比拉克（Alexandra Bilak）说：“我们的报告还显示，大多数因灾害而流离失所的人依然留在国内。”她担心这“将进一步加剧社会经济不平等”。



由秘鲁国防部拍摄
CC BY 2.0

▼ 2017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皮乌拉西北部地区暴雨骤降。照片为暴雨过后正在疏散的当地受灾居民。

组织有序的应对措施

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主任约翰·罗克斯特伦（Johan Rockström）指出：“秘鲁模式向我们展示了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退化在加剧人类流离失所和迁移风险方面的影响。”

埃斯克里瓦诺说：“秘鲁和邻国有着相同的生态系统——高原、沿海和热带雨林，因此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可能也一样，区别就在于政府如何应对。”

他补充道：“在制定关于迁移、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的相关政策方面，拉丁美洲与太平洋国家一样，始终是比较先进的。秘鲁、危地马拉、伯利兹和智利等拉美国家已经在努力改善气候迁移政策。”

法律上还存在一些空白，不过自2000年以来，秘鲁制定了多个气候变化问题参考框架，并已出台了多部适用于气候迁移问题的法律文书和政策。

埃斯克里瓦诺说，气候迁移大多局限在国内，所以责任应由相关国家

承担，不过各方也正在着手制定区域性倡议。

“上一次发生厄尔尼诺现象是在2017年，将近30万人流离失所。”

他还补充说：“南美洲移民问题会议（SACM）是在气候迁移问题上做法最先进的南美区域组织，目前正在制定移民、环境和气候变化政策。”

鉴于自然灾害今后将给南美洲民众造成的影响，这一步显然势在必行。 ■

加拿大： 流亡伤痛的 治疗中心

长期以来，移民和难民的心理问题一直被人们所忽视。不过，随着一些医院开始提供相应服务，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魁北克省杰弗里·黑尔医院的移民和难民专业心理服务中心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这所医院会结合病人原籍国的文化因素来处理病症。

盖伊·萨布林 (Guy Sabourin)

驻蒙特利尔的自由职业记者。

阿萨内·特拉奥雷*是居住在魁北克省的一位难民，他曾经目睹了圣战团体在西非实施的屠杀和暴力罪行，前不久才刚刚从那里离开。每到晚上，他都会把自己和家人关在家里，关上窗户，拉上窗帘，闭紧百叶窗。他还常常感到自己被人跟踪。

“他人虽然在这里，但（觉得自己）还留在那里，其他人也有这种情况。”心理学家让-贝尔纳·波克罗 (Jean-Bernard Pocreau) 解释说：“在祖国发生的往事与他如今的生活已经没有关系。但他的焦虑正在影响他的家人。”波克罗在退休前是魁北克省拉瓦尔大学心理学院终身教授，同时也是移民和难民专业心理服务中心 (SAPSIR) 的创始人之一，特拉奥雷曾经是他的病人。

移民的心理健康问题通常不会比普通人更多 (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每4个人中有1个人在一生中会出现心理健康问题)。但移民在动身移徙之前和到达东道国之后的某些特殊经历可能会加重他们的心理压力。

有机会返回祖国的移民很容易心情抑郁，并且可能把过去的生活理想化。波克罗指出：“假如他们原本就在

心理上存在弱点或脆弱性，这种伤感的情绪会让以往潜伏的病症显现出来，或是使之加剧。”

了解苦难

经历过分离与痛苦的寻求庇护者和难民可能正承受着巨大的悲伤。他们极易出现抑郁和焦虑症状，引发家庭冲突，还会因流亡生活加重创伤后应激障碍。

由此导致的身体机能失调会影响到人的头部、消化系统或脊椎。波克罗说：“尽管缺乏任何可见的身体机能依据，但他们的痛苦是真实存在的。很多移民具有传统文化背景，他们对于困苦的理解方式与我们大不相同。因此，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病情。”这些病症主要影响到他们的自信心、社会关系及其对未来的看法。

在东道国，移民和难民还可能遭受不同程度的制度性暴力和反复攻击。以卢旺达种族屠杀的一位幸存者为例。她在冲突中失去了家人和几个孩子，后来好不容易在魁北克开始了新的生活。一天晚上，她在下班时遭遇袭击。波克罗说：“这次袭击重新唤醒了她以前经历过的所有创伤。她（在新的国家）恢复的

生机与活力被彻底击垮。她整个人陷入非理性的状态，无论走到哪里都觉得自己有危险。”

民族精神病学的贡献

拉瓦尔大学社会工作和刑事学院教授、移民和难民专业心理服务中心创始人之一、心理学家露西安·马丁斯·博尔赫斯 (Lucienne Martins Borges) 介绍说：“2000年前后，移民和难民在出现心理问题时向医疗系统求助，但是感到自己被误解了。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为他们专门建立了一家服务机构。”

移民和难民专业心理服务中心隶属于魁北克省杰弗里·黑尔医院（一家公立医疗机构），毗邻该医院的难民卫生服务部。博尔赫斯说：“多人团队治疗是处理复杂病情的最佳方法。”团队成员包括负责最初建议转诊的医生、一名资深心理学家、一名协同治疗师、一名社会工作者、一名护士、一名口译员兼文化调解员。

博尔赫斯补充说：“我们的病人大多参加过集体互助或社区组织，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小组干预。”按照具体情况，还会安排小组后续跟进。有些



病例由两到三名专业人员的小规模团队负责，在极少数情况下可能由一人负责后续工作。

波克罗解释说：“在会诊时，我们首先必须了解这个人来自于哪种文化，是怎样的成长环境塑造了其人格，以及对此人有特殊意义的种种事物。我们必须逐渐走进病人的世界，相互理解，在彼此之间建立联系。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让对方接受治疗，并且认为治疗对自己有帮助。”这种方法源自民族精神病学，而民族精神病学主张文化因素对于心理问题的各种症状起到主导作用。

治疗团队会与病人见面 15 到 17 次，并对之后接手的干预人员进行监督。移民和难民专业心理服务中心的这种工作方法已经普及到全国各地。

波克罗说：“我从事这一行业已经有 25 年了，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正在见证干预人员的进步。”他认为，魁北克有一部分专业人员从民族精神病学理论和减轻移民心理痛苦的跨文化临床方法中受到了启发。

重拾对未来的信心

移民和难民不仅需要身心两方面感到安全，确信他们有能力规划自己的未

来，还需要知道如何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继续做自己。他们需要时间和保护网，需要周围的人给他们带来安全感。

以一位南美农业工程师的经历为例。他曾经深入农村社区工作，却被民兵投入监狱。抓捕者将他装进一个袋子，扔进水里，并向他开枪。这名

“
移民和难民专业
心理服务中心的
方法主张文化因
素对于心理问题的
各种症状有着
重要意义。”

工程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在到达魁北克时已处于严重的抑郁状态，完全无法想象自己的未来。一次，他参加了魁北克当地的一项河流拯救活动，情况从此有了变化。波克罗在回忆这件事时说到：“这位工程师重新找回了自己熟

悉的环境和曾经了解的世界，也由此体验到了自我的连贯性和延续性。”

博尔赫斯为此欢欣鼓舞：“这就像是整形手术广告中的术前和术后对比画面，可以切实地看到变化。一个弯腰驼背、了无生气、痛苦不堪的人，没过多久就变得精力充沛，面带笑容，而且对未来充满信心。要不是在治疗过程中亲眼见到这些成果，我们可能没有动力继续（工作）下去了。”

这位治疗师还说：“有些病患出现了攻击行为，那并非他们的本意，也有些人伤心沮丧，我们失去了他们的音信。他们不再相信其他人，也就无法与我们保持联系。”

博尔赫斯说：“我们的这套治疗系统可以满足病患的需求，他们中的大多数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意义。”她现在牵挂的是，移民和难民专业心理服务中心针对儿童的相关服务中断了，一些儿童因此受到影响。这项服务计划将于 2021 年秋季恢复。

博尔赫斯最后说：“我担心的是那些没有上门求助的人，特别是儿童，他们中有许多人经历过创伤。想到这些，我常常夜不能寐。” ■

国际包容和可持续城市联盟：友好城市网络

萨利（Säli）、阿里（Ali）和纳里曼（Nariman）三名德国青年被选为人类在一起（Together Human）活动的代言人，他们需要在有限的两周时间内陈述观点。这项活动的发起是为了让人们不再对那些具有移民背景的人持有刻板印象。

2019 年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7 日，该活动通过社交媒体进行了直播，着重介绍了医学院学生萨利、消防员兼运动员阿里，以及海军军官纳里曼的成功事迹。

为了向人们传递促进多样性和包容性的信息，柏林、斯图加特和莱比锡这三个德国城市的街巷都播放着以这三人为主角的视频，并张贴了一千张海报。

除了这项活动之外，国际包容和可持续城市联盟还进行过多种尝试，该国际联盟倡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2004 年发起，旨在强调收容移民和难民对东道国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利用全球 500 多个城市组成的网络，国际包容和可持续城市联盟参与了政策制定、能力建设和提高认识活动，致力于推动包容性城市发展，并消除其中一切形式的歧视。

*为保护受访者身份，使用了部分化名。



▼《被枪杀者的自画像》(1979年),
摄于巴塞罗那圣菲利佩·内里广
场, 出自马塞洛·布罗德斯基
(Marcelo Brodsky) 所著《联系》
一书。马塞洛·布罗德斯基1954
年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 1976年
阿根廷军事政变后, 他被迫流亡巴
塞罗那。

智能手机关系到移民和难民的生死存亡；有了智能手机，他们就能与家人保持联系，在困境中寻求经济帮助，同时找到有用信息，在危机重重的旅途中继续前行。本文作者牵头在摩洛哥菲斯开展了一项研究，结果表明，移动技术在流亡之路的各个阶段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智能手机： 流亡路上离不开的 指南针

莫哈·恩纳吉 (Moha Ennaji)

语言学家、作家、社会活动家，国际语言和文化研究所 (INLAC) 主席兼共同创始人，西迪·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大学 (菲斯) 语言和文化学教授。

22 岁的马马杜 (Mamadou) 来自尼日尔，他总结了智能手机如今在移民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是要吃饭，还是保持网络连接，与家人联系，有时候我不得不作出选择。缺钱的时候，我会通过 WhatsApp 给家里人打电话，他们很快就会把钱转给我。”联合国难民机构联合国难民署拉巴特办事处的数据显示，难民用来上网的费用高达其预算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见便携式设备的重要性。

移民离开祖国之后，凡事都离不开移动电话。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深刻影响着他们在每一段旅程中的经历。这是我与瑞士南方应用科技大学 (SUPSI, 卢加诺) 高级研究员兼讲师菲利波·比格纳米 (Filippo Bignami) 2017 年至 2019 年在菲斯对来自叙利亚、利比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难民及非法移民进行实地调查所得出的结论。

摩洛哥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移民迁出国，不过自 21 世纪头十年中期以来，它就成为了大批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 (特别是刚果、科特迪瓦、马里、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 的移民过境国和接收国。这些移民希望取道休达和梅利利亚这两块西班牙飞地或是加那利群岛，穿越地中海或大西洋，最后进入欧洲。他们通常认为自己在摩洛哥只是稍作停留，但实际上许多人会止步于此，在穷困潦倒中待上几个月甚至几年。

合作与互助

我们的采访对象受教育水平各不相同，这影响到他们的“数字素养”，也就是抓住互联网和移动技术网络提供的机会的能力。

“难民用来上网的费用高达其预算的三分之一。”

意料之中的是，我们发现智能手机能为移民提供在线信息，从而支持他们的迁徙流动——这往往影响着他们启程的动机、对路线和最终目的地的选择，以及在旅途中所经历的一切。

智能手机还方便了移民之间的合作与互助。非法移民往往更加依赖非官方的信息来源，特别是蛇头提供的信息。

蛇头的优势在于熟悉路线、过境点和签证办理程序。我们采访的移民表示，蛇头给了他们准确的信息，而且在旅途中常常通过社交网络提供协助。



▼ 25岁的赛义德（Saeed）从苏丹逃往法国时，随身携带的物品只有一个笔记本、一个包和一部手机。照片出自法国摄影记者马克西姆·雷尼埃（Maxime Reynié）的系列作品“难民的行囊”。

来自喀麦隆的23岁的雷吉斯（Regis）按照蛇头发给他的短信指示，从祖国一路走到了菲斯。不过，也有些移民不愿依靠蛇头的服务，宁愿使用全球定位系统（GPS）和谷歌地图等导航应用程序完成自己的旅程。

与亲人之间的一丝慰藉

对于那些迫不得已踏上危险重重、前途未卜的迁徙之路的人来说，移动电话还是他们与家中亲人之间相互慰藉的联系渠道，而且恐怕比其他任何联系渠道都重要。亲朋好友可以通过 WhatsApp、Messenger、Telegram 或脸书（Facebook）上的消息和照片了解旅途中的情形。

在许多情况下，家人在提供精神支持的同时也会给予经济帮助，后者往往决定了这段旅程能否继续下去。

“信息更加灵通的移民成功到达理想目的地的几率未必更高。”

家人们通常依靠移动技术直接转账。来自几内亚的22岁的亚亚（Yaya）说：“假如没有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络，我会感到更加孤立无援。我通过手机向朋友求助，与家人保持联系。”

但是，新技术并不能保护他们避免与非法移民有关的所有风险。我们的研究表明，信息更加灵通的移民成功到达理想目的地的几率未必更高。就算付出再多努力，他们依然可能沦

为抢劫和袭击事件的受害者，或者在边境被安全装置识别并阻拦，许多人因此被迫滞留在过境国。

新技术还可能制造虚假信息 and 谣言，从而影响未启程的移民作出的选择。来自科特迪瓦的23岁的易卜拉希马（Ibrahima）在互联网上看到有消息说，一旦到达摩洛哥，就会被当作正在求学的寻求庇护者送往欧洲国家，于是他决定离开祖国。后来，他意识到了情况并非如此，便只能每天晚上都冒着生命危险，试图登上开往西班牙的卡车。诸如此类的事情在非法移民当中相当普遍。

若是成功到达目的地，有些人会通过短信应用程序和社交网络分享关于其新生活的信息和图片，他们的这种做法也会影响未来的移民。 ■

维内拉·托克托洛娃： 一位吉尔吉斯移民的 发达之路

十几年前，维内拉·托克托洛娃（Venera Toktorova）来到莫斯科，作为吉尔吉斯移民，她的命运非常典型，先后从事过多种既辛苦又低薪的工作。经过多年打拼，如今的她已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拥有两家餐厅，还与人合办了莫斯科市唯一一家吉尔吉斯电影院。

纳齐古尔·朱苏波娃 (Nazigul Jusupova)

驻莫斯科吉尔吉斯记者。

莫斯科东部有家热闹的咖啡馆，里面播放着亚洲音乐，一位面带威严的女士盯着往来穿梭忙碌的服务员，还时不时查看自己的手机。40岁的维内拉·托克托洛娃身穿一条浅色连衣裙，头发整整齐齐地束在脑后，她就是“苏莱曼至圣之山”咖啡馆的老板。这家店是以她家乡的圣山命名的。

13年前，离婚后的托克托洛娃带着三岁女儿离开了吉尔吉斯斯坦的小城奥什，搬到了俄罗斯的首都。当时的她穷困潦倒，走投无路。但所有的困难都不能让这个女人灰心丧气，毕竟她从小就会在放学后到当地集市上卖口香糖和香烟来帮着养家糊口。

托克托洛娃拥有经济学学位，她本可以在吉尔吉斯斯坦当一名教师。但她说：“我可以想象那样的生活会有多艰难，工资只够勉强维持基本开销。”吉尔吉斯斯坦的平均工资约为每月200美元，比周边各国都要低。2019年，俄罗斯境内就已经有超过100万吉尔吉斯斯坦移民。

托克托洛娃初到莫斯科的生活代表着这个中亚国家移民的典型经历。她回忆说：“当时，大家基本上都去当

维修工，住在地下室里。”托克托洛娃也带着女儿住在地下室。她起初在一栋豪华大厦里当清洁工，后来为了支付女儿的学费，又去做了家政服务员。她拒绝了收入更高的工作机会，因为要干那些工作，她就得把孩子交给保姆照料。她解释说：“能看着女儿长大对我来说很重要。”

梦想的力量

托克托洛娃凭着努力工作，用一年时间就攒足了钱，在家乡奥什买下了一套小公寓。她回忆说：“我当时天刚亮就得起床，跑去第一个主顾家里清洁打扫，然后送女儿上学，再回来接着工作。下午得去接孩子放学，等到孩子睡熟了，我就去另一个主顾家里擦地板。我觉得自己像是轮子上的仓鼠，一刻都停不下来。”

托克托洛娃始终没有再婚，除了拼命工作，她还要努力实现另一个梦想——让自己过上更舒适的生活，拥有一方属于自己的天地。她兴奋地说道：“如今我在莫斯科有了自己的公寓，还买了一台大屏幕电视。这说明美梦可以成真！”

经过这么多年，托克托洛娃已经不再那么迫切地想要返回吉尔吉斯

坦。为了让女儿接受优质教育，为了自己事业成功，她一次又一次推迟返乡。她承认：“有很多次，我离开了莫斯科，告诉自己永远不要回来，但我每次都回来了。”

与初来乍到时相比，托克托洛娃这一路走来，成就不凡。现在的她已是一位功成名就的企业家，与人合作经营着两家餐馆。不过，她在定居莫斯科的同时并没有断绝与祖国的联系。

三年前，托克托洛娃与几名合作伙伴在俄罗斯首都开办了唯一一家吉尔吉斯电影院。由于缺乏经验和管理失误，这项事业很快就失败了。不过，“玛纳斯”电影院开门营业的短短几个月已经

“‘玛纳斯’电影院如今已成为莫斯科市主要的吉尔吉斯文化景点。”

足以调动起托克托洛娃同胞们的观影需求，他们为影院的重新开业积极奔走。

这家影院以著名的吉尔吉斯史诗《玛纳斯》命名，如今已成为莫斯科市主要的吉尔吉斯文化景点。该国移民来这里既是为了寻求娱乐，也是为了一解思乡之情。许多人向托克托洛娃坦言，自己在国外比在国内更喜欢看吉尔吉斯电影。每当走出影院，他们总会感谢托克托洛娃让他们又看到了带着浓浓乡音和童年景物的电影。

吉尔吉斯电影业的复兴

吉尔吉斯电影业近年来焕发出了新的活力。20世纪70年代，作为第七艺术的电影曾在吉尔吉斯斯坦盛极一时。那是个“吉尔吉斯奇迹”时代，青年导演将作家钦吉斯·艾特玛托夫

(Chingiz Aitmatov, 1928—2008年)的作品搬上大银幕。但1991年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建国之后，该国的电影业失去了补贴，进入衰退期。

如今出现了新一代电影人，他们将能带来利润的商业项目与具有观众基础的电影业结合起来。通过这种方式，吉尔吉斯电影成功跻身国际影坛。

“在莫斯科，我得努力工作，但我的新生活是成功的。”

2018年，在艾特玛托夫诞辰90周年之际，吉尔吉斯斯坦驻俄罗斯大使馆向“玛纳斯”电影院赠送了一套由其作品改编而成的电影，让影院可以在整整一年内免费播放“黄金时代”的吉尔吉斯影片。托克托洛娃说：“这真是一份美好的礼物。”她承认自己直到不久前才意识到吉尔吉斯电影竟然是如此丰富多彩。

在离开吉尔吉斯斯坦13年后，这位成功的企业家表示，她还想在莫斯科再多住上几年：“在这里，我得努力工作，克服各种困难，但我的新生活是成功的。我学会了换种方式思考问题，也变得更坚强了。”

不过，时至今日，她从未彻底放弃有朝一日重返故乡的希望：“无论教育程度如何，无论事业是否成功，我们这些移民总是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终究是异乡人。” ■



中国是继印度和墨西哥之后移民海外人数最多的国家。自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便有一代又一代华人远走海外，书写了一部源远流长的中国移民史。

海外华人： 漫长的历史

庄国土

中国福建省华侨大学客座教授，厦门大学教授，主要研究中华民族史和中国国际关系史，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国际移民组织的数据显示，海外华人目前超过 1070 万，如果算上他们的子孙后代，总数约有 6000 万。

这是全球最庞大的移民群体之一。中国的移民史由来已久——始于 2000 多年前华人开通海上丝绸之路，那时的移民主要迁往东南亚。到 15 世纪初，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今印度尼西亚）已经建起了几座华埠，分别居住着数以千计的海外华人。

大规模移民是从 16 世纪末开始的。当时，欧洲人已经在远东站稳了脚跟，打算将这片地区纳入世界贸易网。欧洲各国竞相发展和扩张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对中国商人和劳工的需求应运而生。

17 世纪初，东南亚约有 10 万海外华人，日本约有 2 万到 3 万，他们主要从事贸易和手工业。到 19 世纪中叶，海外华人已经发展到 150 万，大部分居住在东南亚。在日华人也已经融入了日本社会。

两次鸦片战争的影响

中国的第二次移民潮出现在 19 世纪中期到 20 世纪 40 年代初。非技术工人，也就是所谓的“契约华工苦力”，是这次移民潮的主流。经过 19 世纪中期的两次鸦片战争，英国和法国迫使清政府批准大量中国劳工前往西方国家及其殖民地，以替代黑奴。中国人从此开始走向世界——从东南亚到美洲、非洲、欧洲和澳大利亚。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太平洋地区爆发之前，东南亚经济一度繁荣，进一步刺激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而中国移民刚好满足了这项需求。到 20 世纪 40 年代初，世界各地的华侨达到 850 万左右，其中 90% 以上生活在东南亚。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家不再允许大规模移民，延续了

“

在世界各地，华侨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重视对下一代的教育。

300 多年的华人移民潮就此中断，这样的状况持续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

第三次华人移民潮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是当时全球移民浪潮的一部分。大多数移民来自中国大陆，也有部分来自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他们主要迁往工业化国家。当时华人移民海外的首选目的地是美国。

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对外贸易发展，大批中国人选择前往发展中国家。进入中亚、西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中国移民数量激增。





▶ 在洗衣店学习的孩子，纪实摄影师巴德·格利克 (Bud Glick) 摄于纽约。从1981年到1984年，巴德·格利克受美国华人博物馆 (MOCA) 的委托，拍摄曼哈顿唐人街的街头生活、人物和家庭场景。

修建铁路和开采金矿

无论是在东南亚的热带国家，还是在欧洲和美洲的温带国家，海外华人都为建设新家园贡献良多。18 世纪的东南亚，是他们率先修筑公路，开垦荒地；19 世纪的美国，他们建设了港口和城市，并开采黄金；20 世纪的欧洲，他们修建了铁路，开起餐馆和杂货店。

中国移民有着勤劳节俭的传统，为安然度过经济难关，他们往往会攒钱投资房产，并由此在社会上赢得一席之地。每当危机来袭，海外华人总是有能力自保，一般不用向亲朋好友求助，更别说向陌生的社会求援。

海外华人与祖国依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们视中国为故土，这种眷恋之情往往会传递给子孙后代。华人移民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接济家乡的亲朋，通过汇款从经济上帮助家人是海外华人的传统。近百年来，华侨还参与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政府接受的外国投资中有超过三分之二来自海外华侨。

“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移民主要迁往工业化国家。”

难民教育资金紧缺

目前，世界上近一半流离失所者是儿童，其人数近年来不断攀升——学龄难民儿童的数量自 2000 年以来增长了 26%。以上研究结果出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9 年全球教育监测报告》，题目为“移徙、流离失所和教育：要搭建桥梁，不要筑起高墙”。报告强调，这些儿童在理论上应享有获得优质教育的权利，但实际的课堂情况却不尽如人意。

不过，一些国家在帮助这些儿童融入社会方面取得了进展，特别是乍得、埃塞俄比亚和乌干达等主要难民收容国。加拿大和爱尔兰在针对移民实施包容性教育政策方面也有很突出的表现。

然而，由于缺乏合格的教师，为实现包容性所付出的种种努力面临着失败风险。如果要向所有难民提供优质教育，德国还需要 4.2 万名教师，土耳其需要 8 万名，乌干达则需要 7000 名。为了向可能有创伤经历的儿童提供支持，这些教师需要接受专门培训，但实际上他们的培训往往不够充分，或是完全缺乏这方面的条件。例如，在黎巴嫩，只有 55% 的教师接受过相关培训，以满足流离失所学生的需求。

此外，资金也严重不足。报告称，2016 年，全球只有 8 亿美元用于难民教育，仅达到所需资金的三分之一。

特征和成见

海外华人以勤劳节俭著称。在世界各地，华侨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重视对下一代的教育。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海外华人家庭——无论贫富，都愿意为确保子女得到最好的教育而作出牺牲。

这些特点有时加深了外界对于华人移民群体的成见，也进一步扩大了华人与所在国家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鸿沟。

然而，面对如此庞大的移民群体，不可能一概而论。在多种文化不断相互交流的全球化世界里，凡试图给某些群体贴标签的做法都是缺乏远见和理性的。世界正在日益走向融合，而海外华人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探索和确立自己的身份。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针对东亚族裔的歧视随之而来，要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过，海外华人几百年来已经形成了抵御这些成见的力量，或许可以帮助他们应对难题。 ■

牙齿：过往 人类流动的缩影

牙齿在考古学家眼中是一座信息宝库，即使数百年后也可以从中找到当时人类的行程轨迹。

珍妮·戴尔 (Jenny Dare)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考古学家对古代牙齿进行研究，向我们展现了人类的迁徙模式。考古学家、美国密西西比大学人类学副教授卡罗琳·弗赖瓦尔德 (Carolyn Freiwald) 一直从事牙齿的生物学和化学研究，她说：“通过调查分析一个人牙齿的化学构成，就可以得出一部缩微的生命史。”

牙齿在生长过程中会吸收食物和水中的氧、氮和碳等元素。这些化学痕迹可以揭示食物最初形成和最终被摄入的地点。弗赖瓦尔德解释说：“在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背景下，我们都发现了可以证明人类迁徙历史的牙齿样本。我们往往认为古代人都定居一地，然而事实上，人们一直在迁移。”

骨骼在人的一生中会不断再生，但牙齿一旦长成就不会再生成新细胞。例如，第一颗臼齿在婴儿期长成并固定，同时在化学上“记录”了婴儿的饮食。智齿则记录了成年人的饮食内容以及食物来源。根据一口牙齿，就可以绘制出一个人此生所到之处的地图。

为我们提供线索的不仅仅是牙齿本身。矿化的牙菌斑或牙结石是极其

微小的食物和细菌层，堆积在牙齿和牙龈的交界处，它们所含有的 DNA 比骨骼中的含量高 25 倍。2019 年，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的研究人员利用古代波利尼西亚人牙齿上的结石，破译了太平洋上史前人类的迁徙时间和确切的迁徙路线。人类学家认为，研究牙结石能够揭晓古人迁徙模式诸多谜团的答案。

现在，法医学家将这些技术用于确认在危险旅程中丧生的移民的身份。正如弗赖瓦尔德补充的那样，“这项工作有点难，因为现代人吃的食物来自许许多多不同的地方。不过，如果我们在这个领域的多方合作能够帮助人们魂归故里，那么所有的努力就是值得的”。 ■



© Gail Euston-Brown/Shutterstock

伊娃 - 玛丽亚·盖格尔： “一次又一次的迁徙， 构成了人类的历史”

通过分析考古遗址出土骨骼的基因组可知，由于气候变化、冲突或生存需要等原因，人类总是在四处迁移、相互融合。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雅克·莫诺研究所 / 巴黎大学古遗传学研究小组联合负责人伊娃 - 玛丽亚·盖格尔（Eva-Maria Geigl）对此进行了详细说明。

阿涅丝·巴尔东 (Agnès Bardon) 担任采访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古遗传学的任务是什么？

古遗传学是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补充学科。考古学家负责进行实地挖掘，发现骨骼碎片，然后努力还原这些骨骼所属的特定时期和文化。他们对挖掘到的人类遗骸进行分析，可以确定个体的性别、社会地位、患病情况——其中甚至往往显现出社会运作的各种迹象。

古遗传学家的工作是从骨骼中提取 DNA，分析基因组，然后将其与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个体或当代族群的基因组进行比较。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重建谱系关系（亲缘

关联、遗传相似性），也可以还原在漫长的历史中曾经发生过的迁移和通婚。

● 如何利用基因组信息来讲述族群的生物进化史？

通过遗传分析，我们可以描绘出某一地区的族群定居史，从而也就能确定人口的流动情况及其与当地社区的通婚情况。古遗传学发现，8500年前，原本居住在安纳托利亚或爱琴海一带的农民迁往欧洲西北部。大约12000年前，农业和动物驯养业在中东的新月沃土、伊朗和安纳托利亚逐渐发展起来；大约8500年前，这些农民开始通过陆路迁往欧洲，迁徙路线始于希腊，途径巴尔干半岛，穿过匈

牙利、奥地利和德国，最后到达法国北部（巴黎盆地）。

另一条路线沿着地中海海岸，经过今天的克罗地亚、意大利、西西里岛、撒丁岛和科西嘉岛，进入法国南部和伊比利亚半岛东北部。我们能够了解这些现象，是因为对挖掘过程中发现的遗存进行了分析，其中包括陶器碎片、燧石工具或绵羊等驯养动物的骨骼，它们都是随着那些农民散落到沿途各处的。

不过根据现有的材料，考古学家还无法确定，是新月沃土地带农民的技能和技术得到了传播，还是这些技术的发明者本人踏上了迁徙之路。通过基因组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这

些农民与已经在欧洲生活了大约14500年的当地狩猎采集者混居，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与本土族群通婚。

● 基因组分析会为人们了解史实提供新的线索吗？

2012年，人们在俄罗斯阿尔泰山的丹尼索瓦山洞里发现了一具年轻女孩的遗骸，她生活在距今至少50000年前。对女孩指骨的基因组分析证明了现代尼安德特人的存在。这个族群曾经居住在亚洲各地，逐渐发展壮大并与来自非洲的第一批智人通婚。而在此之前，古人类学家一直对该族群的存在抱有怀疑。

另一个例子是颜那亚人向欧洲的迁移。他们来自黑海以北的大草原，靠畜牧为生，大约5000年前涌入欧

洲中部和北部。这些草原游牧部落人口多为男性，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与欧洲当地农民通婚。他们的生殖成功率较高，由此引发了显著的基因组替换（又称基因渗入）。

时至今日，法国西部的布列塔尼地区、爱尔兰和英国仍有80%至90%的男性携带颜那亚人的Y染色体。除此之外，我们至今没有发现颜那亚

“在遗传学上没有‘血统纯正’的族群。”

人迁移留下的任何蛛丝马迹，所以考古学家并不知道这一现象。

● 我们知道各种迁徙的起因吗？

我们可以设想到几种原因，但这些只是假设，并没有科学依据。迁移或许是由气候造成的，又或许与人口有关。迁移可能是出于族群生存的需要，比如，狩猎采集者会跟随大型动物迁徙而迁移。当气候发生变化时，人类就得另寻定居之地。族群之间的冲突也可能是原因之一。就像今天的我们一样，数千年前的人们会因为气候、生存需要或冲突而踏上迁徙之路。

● 根据对祖先的基因组分析，是否可以说我们人人都是移民？

确实如此。首先，我们都是非洲人，因为我们的祖先来自那里。过去，智人在非洲大陆发展进化，又分批离开故土，其中最后一批就是我们的直系祖先。其次，我们都是移民，因为一次又一次的迁徙构成了人类的历史。自古以来，人类族群从未停止过迁移和融合。这有时会导致当地人口被外来者取代，但也不完全如此。

人类是不习惯定居的。由于环境发生变化，我们总是必须迁徙，必须适应。在遗传学上没有“血统纯正”的族群。这是件好事，因为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让基因组进行混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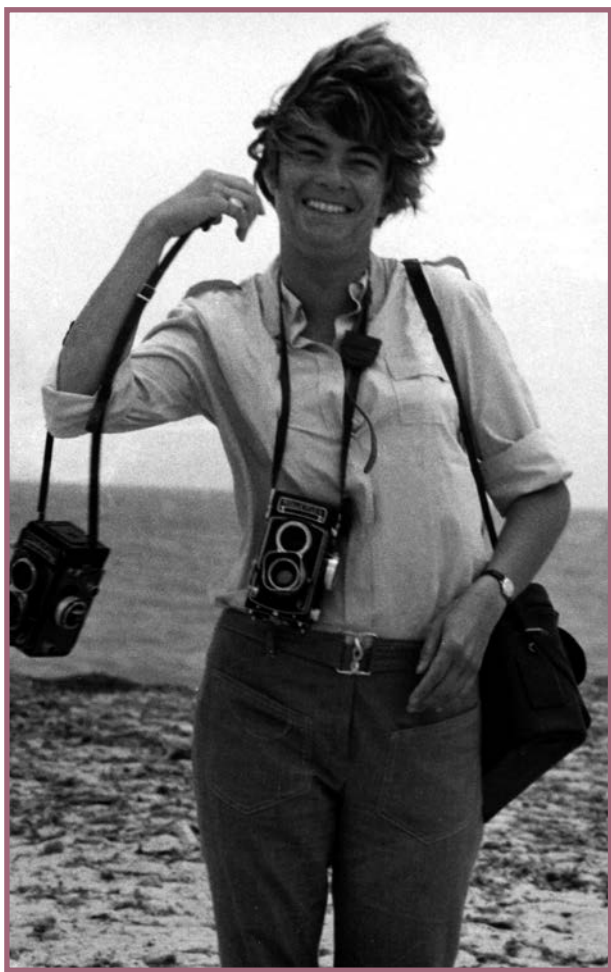
▼ 《你我皆为移民》，塞尔维亚插画家戈兰·巴吉奇（Goran Bajić）的绘画作品。

多米尼克·罗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了我 整个世界”

摄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米尼克·罗杰
(Dominique Roger)

文字：卡特琳娜·马尔可洛娃 (Katerina
Markelova)，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版权所有

20 世纪 70 年代，多米尼克·罗杰在进行拍摄任务。

1966 年 11 月 4 日，威尼斯地区周期性泛滥的罕见大潮——“acqua alta”冲垮了沿海防潮堤，整个城市淹没在一米多深的洪水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呼吁，号召国际社会团结一致，世界各国纷纷响应，前来拯救此处的建筑奇迹。

多米尼克·罗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往现场，报道了人们为拯救威尼斯古迹和壁画所付出的努力。而当时，这些古迹和壁画尚未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罗杰的摄影生涯长达 30 年，并曾在 1976 年至 1992 年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摄影部门负责人，期间，她多次执行外派任务，用影像记录下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总部和世界各地开展的行动。

从 1978 年南非歌手米丽娅姆·马凯巴 (Miriam Makeba) 的个人演唱会，到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IOC) 首次部署水下传感器，再到在佛得角、伊朗和秘鲁开展的扫盲运动，这位摄影记者展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总部和其他地区开展的日常工作。罗杰拍摄的照片是重要的见证，也为充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视觉记忆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 2016 年出版的《和平之路》(*Un chemin vers la paix*) 一书中，她写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了我整个世界，让我认识到差异、不平等和‘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简而言之，让我了解了‘其他人’。”2018 年，这本书还推出了英式西语版。

多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Courier*) 的很多版面都刊登了罗杰拍摄的照片。她的作品也曾在几个国际展览中展出。 ■

这一回顾性特写是为了纪念 1946 年 11 月 4 日生效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颁布 75 周年。

埃及尼罗河菲莱岛上伊希斯神庙的一小部分（1968年）。阿斯旺大坝建成后，这片著名考古区面临被淹没的威胁。196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拯救努比亚遗址国际行动”，定下宏伟目标，该行动持续20年，获得圆满成功。





修复埃里希洪的女像柱，摄于1968年。197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一项修复和保护雅典卫城古迹的运动。此前的几个世纪，这些古迹遭受了战争、地震、火灾、水灾、空气污染和大众旅游的破坏。

佛罗伦萨达万扎蒂宫殿的修复间内正在进行一座小天使雕塑的清理，摄于1967年。这样的行动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一项国际运动。该运动旨在保护和修复1966年11月4日大洪水中受损的佛罗伦萨文化遗产。



威尼斯艺术家乔瓦尼·巴蒂斯塔·皮亚泽塔（Giovanni Battista Piazzetta, 1682—1754年）创作的一幅油画，存于威尼斯最大的教堂圣若望及保禄大殿。1968年，佩德罗科（Pedrocco）教授对这幅画作进行了修复。

威尼斯泻湖垃圾倾倒入造成的水污染，1968年。







1. 1978年3月21日晚，南非歌手、词曲作家和民权活动家米丽娅姆·马凯巴（Myriam Makeba）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了小型个人演唱会，标志着国际反对种族隔离年的正式启动。

2. 1974年1月9日，小提琴家兼指挥家耶胡迪·梅纽因（Yehudi Menuhin）和钢琴家兼作曲家威廉·肯普夫（Wilhelm Kempff）在巴黎普莱耶音乐厅（Salle Pleyel）排练，准备参加纪念国际音乐理事会成立25周年音乐会。该理事会于25年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求成立。

3. 1978年5月，塞内加尔总统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左）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Amadou-Mahtar M'Bow）一道参观巴黎总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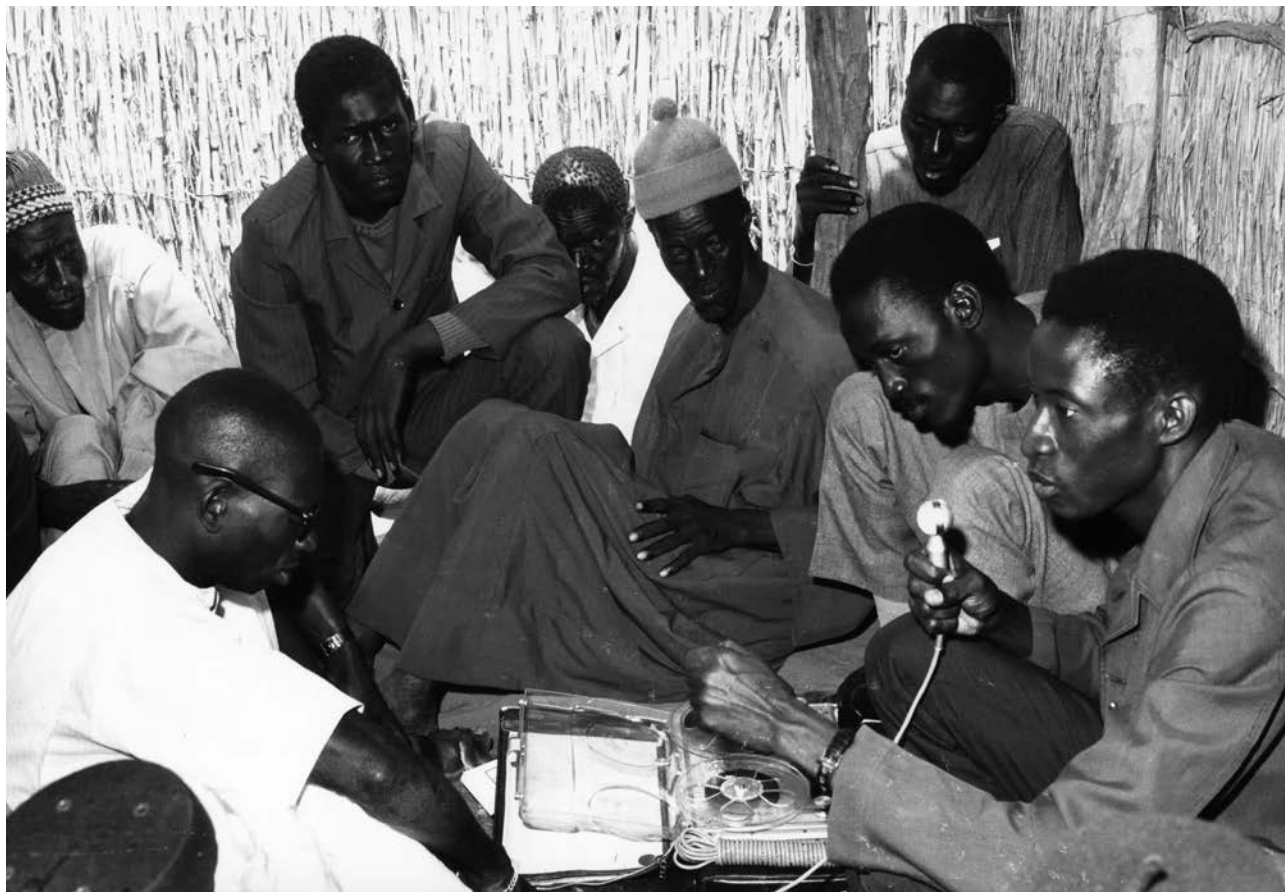
4. 1966年，印度音乐家兼作曲家拉维·香卡（Ravi Shankar）在巴黎总部参加纪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20周年的音乐晚会，并进行表演。



1989年，位于马达加斯加诺西贝的国家海洋学研究中心采集海水样本，用于测量温度和盐度。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的项目之一。



1969年，日本东京，一名学生模拟由液压装置传到“振动台”上的微型地震。这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与日本政府的合作项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担任执行机构。项目旨在对国际地震和地震工程研究所的专家进行培训，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地震造成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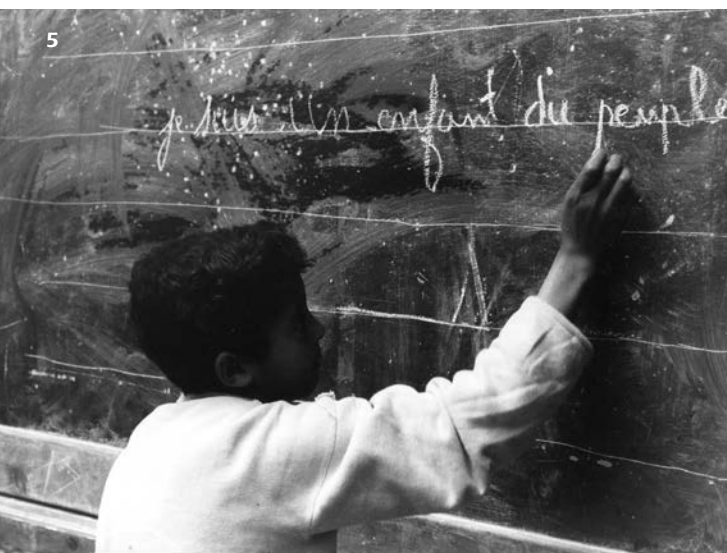


1971年，塞内加尔塔塞特的农民在乡村教育广播节目中讨论他们关心的问题。

1965年，伊朗卡兹文的儿童和成年人在参加政府的扫盲试点项目。该项目由来自“知识军队”的志愿者运营，这些志愿者均为军队服役人员，同时兼任乡村教师。







1. 1967年，秘鲁潘普洛纳的一所学校/一个社区中心，该学校/中心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助。白天，这是一所可容纳600名学生的女校，到了晚上和周末，便成为家长们的娱乐中心，提供识字、缝纫、编织和急救课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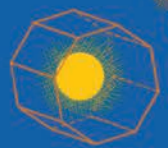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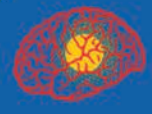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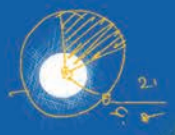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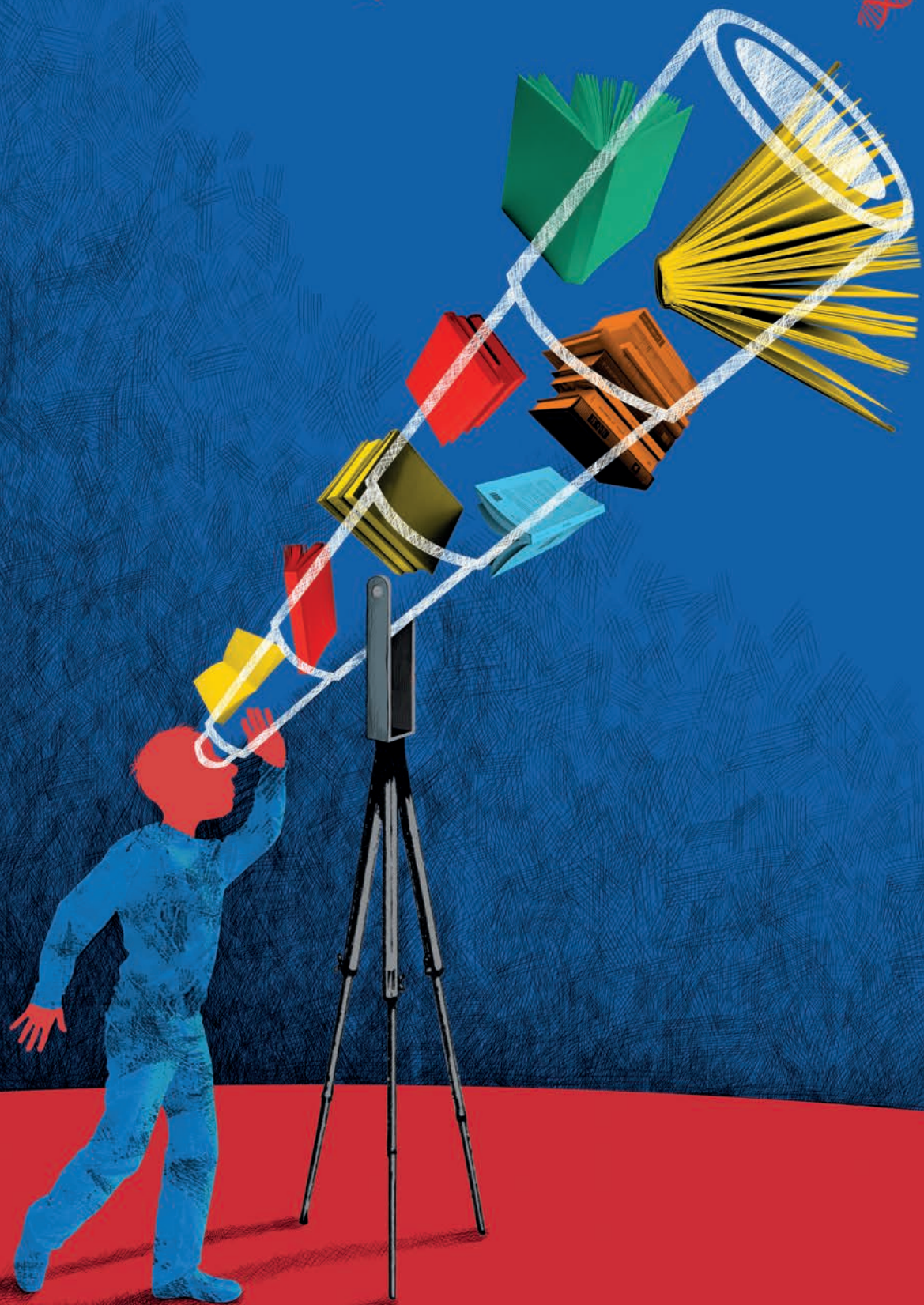
2. 1969年，韩国首尔南部军浦市小学的一名学生。该小学当时有1430名在校生。

3. 1967年，厄瓜多尔，一个侧重实用性的成人扫盲班。多米尼克·罗杰写道：“1967年，我35岁。作为摄影师，年长者努力识字的场景令我无比感动。在一间简陋的小屋里，饱经风霜的老人借着油灯发出的幽暗亮光伏案阅读面前的笔记本。无论曾经还是当下，这都是思忖一幅画面的完美时刻。”

4. 1990年，在佛得角福戈岛的农村农业区参加扫盲计划的妇女。

5. 1964年，一名学生在阿尔及利亚杜阿拉的霍尔登堡(Chateau Holden)，这是一所专门为擦鞋男童设立的福利中心。

$$\forall z \in \mathbb{Z}^+, f(z) = \frac{1}{1+z} = \frac{1}{z} - \frac{1}{z+1} = \frac{1}{z} + \frac{(-1)(z+1)}{z+1}$$



al



开放科学：

一场促进科学发现的全球运动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流行促成了科学数据共享方面的实际进展。然而，要实现真正的“开放科学”，让人们可以毫无障碍地获取科学出版物、数据，以及顺畅开展协作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公共利益的理念正在深入人心，特别是在年轻一代研究人员当中，但科学知识商品化依然是现行的规则。就在我们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公民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已然走到了危急关头。

谢里法·布卡塞姆-泽格穆里 (Chérifa Boukacem-Zeghmouri)

法国里昂第一大学（克洛德·贝尔纳第一大学）信息和通信学教授。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我们看到世界各国的研究人员已经开展了大量合作与科学知识共享，目的是遏制病毒、提供最佳治疗方案，还有最重要的开发疫苗。我们有幸见证，爱思唯尔、施普林格-自然和约翰威利等著名科学出版集团破除障碍，开放了数以千计的研究论文，让世界各地的科学工作者都能够通过阅读这些文章了解最新研究进展，从而加速推进自身的工作。

除此以外，数据和元数据（描述其他数据的数据）也可供科学工作者群体共享。一时间，科学知识这种公共产品摆脱了陈旧、僵化且不利于其传播的商业分配形式。

这种情况唤醒了支持开放科学的讨论。今天的人们之所以如此迫切地要求实现开放科学，是因为在发表科

研成果的问题上，科学已经变得有些高不可攀了。对研究人员来说，发表成果的成本很高；而对于希望订购知名出版物的图书馆来说，订购费用也太高。

科学知识商品化

通过分析支持开放科学运动出现的历史背景，可以看出这种“封闭”源自科学知识商品化的漫长进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科学知识已经形成了利润丰厚的市场，每年可以为这一领域的主要行为体——科学出版商带来数十亿欧元的收入。

在当前的表述中，关于科学开放的要求更多地指向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构建科学组织的商业和管理原理，

而不是强调对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极权主义逻辑的谴责。

然而，这些要求还与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K. 默顿 (Robert K. Merton, 1910—2003 年)、奥地利裔英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 (Karl Popper, 1902—1994 年) 的早期论点有关。他们谴责科学垄断是新形式的商业极权主义，侵占了公共利益——在公共行为体和公共资金的协助下创造和生产的科学知识。

开放科学倡导可得、共享、透明、再利用、与社会互动等价值观。由于数字平台和基础设施的出现，这些价值观现在可以转化为具体的条款。此外，应当结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来看待这种“重构”。科学必须考虑到虚假新闻传播、民粹主义兴起和不平等现象加剧等问题，持续更新自身与社会之间的联系。



新生代

这场疫情让公众看到了与科学开放有关，而此前仅局限于学术领域的另一个现象。我们正在目睹新一代网络平台的出现，而负责管理这些平台的科学社区采用了开放科学的原则、良好做法及标准。

在这些科学社区占据重要地位的年轻一代研究人员正在不断测试、创新和实验，以期重塑科学交流模式，使之更加开放——包括对社会开放，依靠各方的评论意见来促进科学进程。这些年轻人是在网络和数字技术的陪伴下成长起来的。面对那个必须以在声名显赫、拣选严格且异常昂贵的期刊上发表论文作为“敲门砖”方可进

“对于开放科学的关注已经写入国际政治议程。”

入的科学体系，他们敢于以自身力量去撼动。

其中一些平台在传播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科学信息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研究人员能够实时分享成果，以速度更快、协作性更强的方式开展工作。这些平台的价值在于凭借人工智能开发出的先进功能和服务，尤其是处理源源不断的资源的能力。平台不

提供传统意义上的同行评议，而是尝试采用一些新模式，在动员社群协作的基础上允许论文采用某些专业知识。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以及陈和扎克伯格基金会等赞助研究的私人机构对这些新模式很感兴趣，并给予了支持。这种支持带来了实际资助，不过正如我们曾经看到的那样，它也蕴含着回收甚至接管的风险。

对开放科学的关注不仅限于学术界，这个问题已经被列入欧洲和国际社会的政治议程。这场运动的范围不仅限于科学出版物的开放获取，还涉及研究数据的开放（遵循“尽可能开放，必要时关闭”的原则），以及21世纪特有的“公众科学”。一些国家正在着手采用促进科学知识共享的政策。



插图：© Boris Séménako，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提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开放科学的建议书

在 2021 年 11 月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上，组织会员国将讨论《关于开放科学的建议书》草案。这份文件的目的是确定与开放科学有关的共同价值观，提出开放数据获取渠道的具体措施建议，促进科学知识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

此次审查是基于历时两年、包容透明的磋商进程取得的成果，期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各国科学院、大

学、图书馆、出版商和青年研究人员建立了伙伴关系。草案初稿由来自世界各地的 30 名专家组成的科学委员会负责，在此之前，已有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机构等 2900 名参与者进行了全球磋商。

这份建议书是向推动国际合作与普及科学知识迈出的关键一步。

这种关注还体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于 2021 年 11 月向会员国提出一份《关于开放科学的建议书》，用以促进国际合作与普遍获取科学知识。建议书的内容涵盖出版物、数据、软件、教育资源和公众科学，强调应该让科学掌握在学术界和公民手中，并通过他们之间的合作来确保科学发展目标的确定能够摆脱货币化逻辑及其制约。

出版物的开放获取

在这种国内及国际政策的支持下，一个在 20 年前看似“乌托邦”的研究框架已经建立起来。世界各国开放获取的出版物数量持续增加——估计到 2030 年，将有 75% 的出版物实现开放获取。人们对于研究数据开放获取的认识正在不断提高，对于相关问题和做法的理解也在日益加深。利用社交网络和视频形式开展新型科学交流，是研究人员自发形成的创意。

曾经誓死反对开放科学的主要科学出版集团，现在反而成为开放性的积极捍卫者。为支持当前的转型工作，这些出版集团正在纷纷迁移各自的数字平台。

出版商与图书馆之间关于订购费的谈判，如今变成了关于“转型协议”的谈判，重点是在出版商开办的期刊上发表论文的费用，或是以同样价格可以发表论文的数量。由于国际大学排行榜会考虑到论文发表数量，在大学努力提高国际排名的时候，这些问题就显得很重要。

目前仅存的不平等体现在有权限的读者和无权限的读者之间，而这种不平等又转移到有能力支付相关费用，可以在开放渠道上发表作品的作者和无力承担相关费用的作者之间。后者今后只能在传统期刊上发表论文，这些期刊通过订阅方式提供内容，价格非常昂贵。

“
开放科学倡导
可得、共享、
透明、再利用、
与社会互动等
价值观。”

由此可见，开放科学是在相关政策日益国际化，同时相关社区也更加活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关社区在原有模式之外创建了新模式，据此提出的各项倡议和实践也焕发出新的生机。逐步形成的新模式正在努力摆脱以往的垄断。围绕这些问题正在发生一场科学变革：脱离排他性的货币化逻辑，消除获取知识方面的不平等，打破因数字技术而加剧的新形式垄断。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更好地应对当今社会的复杂挑战。 ■

科研论文在发表之前，需要经过同行和专家评审，研判研究方法是否严谨，研究结果是否可靠。然而，这个至关重要的流程却存在一些严重的不足，同时它也完全绕过了公众，让人们无从获取一些必要知识来了解科学是如何发展的。

让科学评估 更透明

亚历克斯·霍尔科姆
(Alex Holcombe)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心理学学院教授。

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已经过去了一年半，科学在这期间挽救了无数生命。假如没有生物医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就不可能开发出疫苗，也无从评估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但关于这场大流行病，科学界还有一些重要问题没有弄清楚，例如，模拟病毒传播方式的模型是否可靠。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许多相关研究存在缺陷。

科学是复杂的，开展科学研究很容易出现失误。要有效评估研究可能带来的影响，必须由专家进行审查。这个过程就叫作同行评审，用来评价最新科研成果，且从不对外公开。作为一名研究人员，我根据经验发现，其他研究人员往往能够看出我自己注意不到的工作疏漏。然而，同行评审的过程本身也可能是有疏漏的。

相关研究人员需要花时间将自己的科研成果提交以接受更多测试，并且让多名专家对成果进行深入审查，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最新科研成果才是真实可信的。研究论文一经发表，科学家和其他人就只能看到研究人员的书面论文，再也看不到其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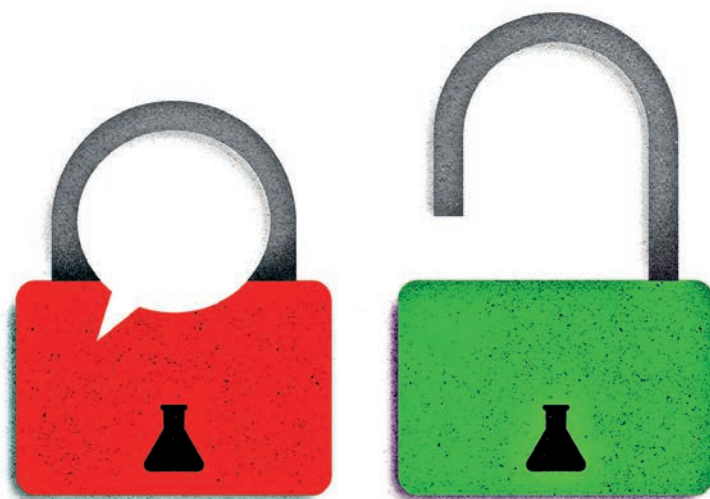


插图:© Francesc Hoig, 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提供。

“
让公众有机会了解专家辩论情况，可以进一步普及科学知识。”

闭门评审

按照传统做法，研究团队将介绍自己最新研究成果的原稿递交给科学期刊后，同行评审即告开始。期刊编辑（通常是另一所高校的学者）会阅读论文并判断文章是否达到期刊的标准。假如符合标准，这名编辑将召集相关专题的专家开展评审。

通常会有一名或多名专家向该期刊提出一连串的意见和批评，再由该期刊转发给论文作者。这些意见可能会冲击研究结论，要求研究者提供更有力的论据，或是要求研究者提出的主张不要过于绝对。

作为一名作者，我自然不喜欢听到有人批评我的论文，但我也知道这是促进科学进步的必要一步。在纠正了逻辑失误，或者证实了此前没有得到证明的假设之后，我会更加坚定对研究结论的信心，同时也希望这些结论能够激起更大的反响。

经过作者、编辑和专家评审员之间的往来互动，定稿最终成形，无论最后能否发表，它都体现了更加严谨的数据分析，以及对文章可能产生的影响更审慎的态度。

但遗憾的是，公众从来不知道论文中有哪些内容曾经受到质疑，也不知道辩论各方对于哪些问题的争议最多。这是因为同行评审不是公开进行的，而是在有密码保护的期刊数据库内完成的。公众要想知道各位专家的不同立场，必须首先了解同行评审过程中出现的意见分歧。

有争议的论文

2020年，关于羟氯喹和降压药如何影响新冠肺炎病程的两篇论文经过常规同行评审并发表，随后被撤稿。《柳叶刀》（*The Lancet*）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NEJM*）是全球最富盛

名的医学期刊，并且都曾组织专家对这两篇论文进行同行评审。《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在收到四位专家的意见之后同意发表论文，而且按照惯例，同行评审过程中提出的不确定性和问题均未向大众公开。

直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专家们说过些什么。我们只知道，有多名并没有参与同行评审的科学家很快就发觉相关数据可能有问题，并在论文发表几天后就向期刊发出了批评信。

“科学期刊的编辑依然没有注意到女性研究员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人员。”

在这起事件里，正因为相关主题备受关注，各方专家才复审了该论文并撰文质疑。但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常见。

涉及大流行病的论文事关重大，但除此之外，其他论文的评估情况很少公之于众。2013年，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自己成功重构了艾滋病病毒（引发艾滋病的病毒）表面蛋白质的最小结构，他们的论文也被刊登在全球最著名的期刊上。但人们后来发现，此前至少有四家期刊曾经拒绝发表这篇论文，部分是因为同行评审员提出了强烈批评。所有这些情况都没有公开。要不是有一些记者向其他专家打探消息，科学界对此还一无所知。

由于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许多期刊正在打开大门，让外界有机会看到前沿科学领域特有的激烈分歧。许多研究人员开始采取先将论文公布在

互联网上，然后再向期刊投稿的做法。供科学家们讨论和批评新研究的网站现在分外热闹。

期刊编辑发现，现在越来越难找专家开展传统评审工作了。许多编辑以往寄希望于自己熟识的专家，以及经验丰富且人气极高的研究人员，这种做法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的需求。以此来进行的同行评审不仅耗时长，也没有反映出科学界人员结构的变化。

如今有更多的女性和少数群体涉足科学领域，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贡献正在迅速增加。但主要设在北美和欧洲的期刊编辑部里的资深科学家们依然没有注意到这些新晋研究人员。

随着新的批评和评论渠道的出现，这些问题可能会逐渐得到解决。一些期刊现在请专家在相关网站上公开发表意见。通过完善这种做法可以促进同行评审的多样性。

深入了解科学

在科学界，专家们在研究领域进行的对话定义了最前沿的知识，他们可以表达对新疫苗有效性的犹疑，可以预测某国今后将遭遇更多干旱，可以评判饮食建议是否可信，或是估计关税可能产生的经济后果。如果记者和公众有机会了解专家辩论情况，那就意味着媒体报道可以更加准确，从而可以进一步普及科学知识。

专家也会因此受益。研究人员如果能够听到同行评审提出的一些意见，就不会以为某项科研成果无懈可击，而是会重新考虑自己的结论。这对研究人员乃至整个科学事业都是有好处的。 ■

拉丁美洲： 恐龙的黄金时代

米丽娅姆·佩雷斯·德洛斯·里奥斯 (Miriam Pérez de los Ríos)

智利大学（圣地亚哥）人类学系研究员，工作重点是通过研究头骨化石来确定不同物种之间的系统发生关系。她同时也是智利古生物学协会高级会员。



拉丁美洲的重大古生物发现近年来呈现井喷之势，这一地区有时被戏称为“恐龙工厂”。

古生物学家和中新世古猿（距今 2300 万至 500 万年前）进化专家米丽娅姆·佩雷斯·德洛斯·里奥斯向读者说明，这些科学进步是相关学科受到更多关注的结果，而新的研究方法也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

劳拉·贝尔德霍（Laura Berdejo）担任采访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近年来在拉丁美洲的发现有什么重要意义？

拉丁美洲，特别是南锥体地区，对人们了解恐龙的起源和进化而言具有重要意义。阿根廷的拉里奥哈地区曾有过诸多发现——古生物学研究在该国传承已久。1991 年，已知最古老的恐龙之一——生活在大约 2.3 亿年前的月亮谷始盗龙（*Eoraptor lunensis*）化石在当地被发现。巴西的多个科研小组如今正在这片边境地区搜寻更古老的样本。

整个中生代（2.5 亿至 6600 万年前）遍布着恐龙的印记。全球五大洲都有恐龙在白垩纪末期（6600 万年前）大规模灭绝之前留下的遗迹。在该地区发现的化石样本涵盖了恐龙的整个生存时期，直至它们与地球上其他地方的同类同时灭绝。

体型最大的恐龙——泰坦龙的遗骸是在拉丁美洲南锥体地区出土的。这类恐龙可以归入一个独特的类别，例如迭戈苏亚雷斯智利龙（*Chilesaurus diegosuarezi*）就是已知的少数几种草食性兽脚亚目恐龙之一。此外，当时还挖掘出了世界最南端的恐龙——在智利的托雷斯德尔潘恩出土的巨大蜥脚类恐龙。

● 这些发现能否在全球范围内改变人们对于恐龙的现有认知？

当然能。古生物学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将新发现的样本与已经确定的样本进行对比，从而确定系统发生位置，



▼ 泰坦龙蜥脚类恐龙（左）是四条腿的长颈食草恐龙，在拉丁美洲极为普遍，但也生活在世界其他地区。

© Oscar Sanisidro 提供

也就是新样本与其他恐龙的亲缘关系。进一步开展挖掘以及和已知遗骸进行对比，我们就能够了解这些恐龙的进化情况，并通过观察形态的变化来认识物种的形成过程（在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新的独特物种）。

正是以这种方式，2021年4月，智利圣地亚哥的国家自然史博物馆证

“在阿根廷发现了已知最古老的恐龙。”



▼ “迭戈苏亚雷斯智利龙的数字重建”（2018年）。这种食草恐龙的遗迹被发现于智利南部，生活年代约为1.5亿年前。2015年，人们首次对这种恐龙进行了具体描述。

CC BY-SA 4.0, Liam Elward

明了大约30年前在该国北部的阿塔卡马沙漠发现的遗骸属于一种前所未有的泰坦龙——阿塔卡马骨龙（Arackarlicanantay）。

● 近年来在拉丁美洲有了一系列发现，您会如何解释这些发现？

这些最新发现表明拉丁美洲在古生物学等学科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进展。一直以来，阿根廷始终是拉丁美洲化石研究领域的佼佼者，这要归功于该国对相关学科的密切关注，以及发现了20多个物种的何塞·费尔南多·波拿巴（José Fernando Bonaparte）、研究大型蜥蜴类动物遗骸的专家鲁道夫·卡萨米克拉（Rodolfo Casamiquela）等一批杰出的古生物学家。

在厄瓜多尔、哥伦比亚、智利、巴西和秘鲁等其他国家，经过大学和研究中心的众多团队的不懈努力，相关知识近几十年

来呈现出爆炸式增长，其中一些研究小组与国际团队（主要来自美国）建立了联系。

● 新发现频繁增多，研究技术的发展在其中是否也起到了作用？

我想说的是，频繁获得更多新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依靠方法——人们使用的方法依然非常传统，而是依靠建立接受过高水平科学培训的当地团队。近年来，曾经前往美国和欧洲攻读博士学位的青年科学家纷纷回国，开始发展当地的动物化石研究项目。他们不仅在巴塔哥尼亚、热带雨林地区等未开发的偏僻地区发现了新的材料，而且“重新发现”了被遗忘在国立或地方博物馆里，静静等待古生物学家将其复活的原有材料。

不过，实验室技术确实有助于向人们揭示化石的某些新特征，例如利用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CT）查看颅内空腔或内耳的情况，这在以前是不可能做到的。由于有了分析生物组织结构的组织学，人们现在可以研究骨骼生长情况。有限元分析（FEA）帮助我们进一

一系列发现

2021年1月发表在《白垩纪研究》（*Cretaceous Research*）上的一篇研究报告指出，在阿根廷内乌肯河谷挖掘出的9800万年前的化石可能属于有史以来体型最庞大的恐龙。

2012年，研究人员首次开始发掘一个巨大的蜥脚类动物留下的骨骼化石。这具骨架非常不完整，但专家认为它可能比巴塔哥泰坦巨龙（Patagotitan）还要大。后者长122英尺，近70吨重，是目前已知的最大恐龙。世界各地都发现过这种长颈蜥脚类动物，其部分末期物种生活在拉丁美洲，并且进化成了庞然大物。

古生物学家发掘出了24块椎骨以及部分骨盆和胸带，目前还不能确定这些巨大的骨骼到底是属于已知物种，还是属于某个已知的巨大恐龙化石样本。

2021年3月，阿根廷圣路易斯国立大学宣布发现了异颅骇龙（*Llukalkan alicrocranianus*），这是一种巨型食肉动物，大约8000万年前生活在如今的阿根廷一带。2021年4月，智利圣地亚哥的国家自然史博物馆宣布发现阿塔卡马骨龙这种泰坦巨龙的长度超过20英尺，6600万年前生活在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



▼在智利发现的第三种非鸟类恐龙阿塔卡马骨龙是非常独特的物种。20世纪90年代，地质学家卡洛斯·阿雷瓦洛（Carlos Arévalo）在阿塔卡马地区发现了这种“新”恐龙；2021年4月，智利国家自然史博物馆进行了关于这种恐龙的展出。

步认识了动物的运动和咬合。有限元分析是一种数值计算方法，可用于模拟机械行为。

●新冠肺炎疫情是否影响到了拉丁美洲的古生物学研究？

全球卫生环境对必须开展野外研究和实验室工作的所有研究人员都构成了挑战。出于各种原因，比如来自不同国家的成员无法参加，资金中断，或是出资机构不得不将预算用于疫情控制工作，许多研究团队都取消了野外工作计划。

此外，博物馆和科学机构也关闭了，致使研究人员拿不到有待分析的馆藏化石样本。古生物学会也不得不改弦更张，改用远程会议形式，专家之间的交流仅限于简单的录音发言，而缺少了对于科学研究至关重要的反馈和讨论。我渴望着有朝一日能够再次见到昔日的同事，接触到我们的研究材料。我想这是所有科学工作者共同的心声。

●假如你所在的研究机构要为今后五年的资源和能力需求列出一张“梦想清单”，你会提出哪些要求？

我认为研究工作的核心需求大同小异：资金、意愿和训练有素的团队。少了机构对于研究项目的认可和支持，团队无论多么渴望彻底改变国家或地区的古生物学研究，都无法开展工作。此外，在面对古生物学研究提案时，地方评估者往往缺乏相关知识，提不出积极的评估意见。这意味着最终会有部分研究项目无法落实——尽管从全球角度来看这些项目会非常有意义。

最后一点，由于南美洲国家缺少专家，拉丁美洲的这一领域发展缓慢。幸好我的同事们已经开始在当地培养科学人才，五至十年后可能会出现具有国际意义的重大发现。除此之外，关键是要能够采用高端设备来支持人才培养，然而，拉丁美洲没有这些设备，或是这些设备没有经过国际认证，因此科学界的部分人士对其产生的结果不予承认。

虽然经历了种种困难，但古生物学正在拉丁美洲蓬勃发展。目前有几处研究地点，主要分布在阿根廷（内乌肯地区）和智利。在智利安第斯山区的特马斯德尔弗拉科地区，人们正在研究一处恐龙脚印。 ■



▼米丽娅姆·佩雷斯·德洛斯·里奥斯（前排）在匈牙利鲁达巴尼亚一个1000万年前的遗址进行挖掘，该遗址曾出土中新世猿类的遗骸。

记者： 一份高危职业

袭击，恐吓，甚至谋杀。世界各地的记者每天都面临着严重的风险和威胁，而这仅仅是因为其所从事的工作——报道新闻，向公众提供信息。

琳达·克拉森 (Linda Klaassen)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过去十年里，平均每四天就有一名记者被杀害。自 2016 年以来，每年发生在非冲突地区的记者遇害事件比发生在武装冲突国家的还要多。据报道，从 2020 年到 2021 年 6 月末，全世界共有 86 名记者遇害。

对记者犯罪不受惩罚的现象仍普遍存在，每 10 起案件中，有 9 起未判定加害方的罪责。不过，在 2020 年，这样的情况略有改善，全球报告的此类案件中有 13% 得到了解决。2019 年，这一数字为 12%，2018 年则为 11%。很多情况下，有罪不罚现象是司法系统本身的瓶颈造成的。

虽然遭遇致命袭击的女性记者占比较低，但在线上和线下，她们都特别容易受到基于性别的威胁和骚扰。近年来，这类攻击事件显著增加。基于国际记者中心 (ICFJ) 开展

的一项大型跨学科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2021 年发布了一份讨论文件——《不寒而栗：针对女性记者的网络暴力全球趋势》。其中，女性记者们认为，在煽动和助长针对妇女的网络暴力行为方面，政治领导人、极端主义网络和党派媒体是罪魁祸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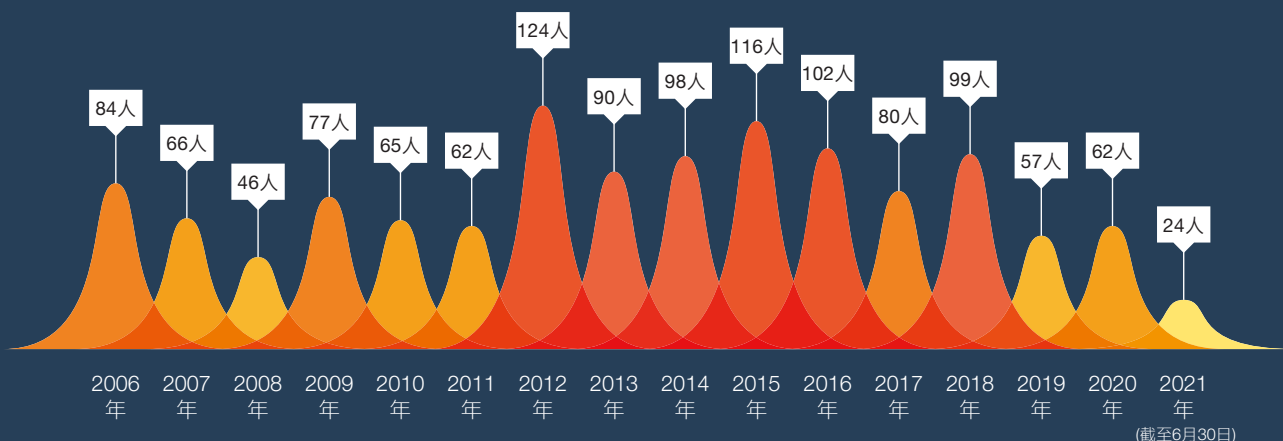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流行的背景下，也有世界各地的媒体工作者由于向公民传递健康危机信息而遭遇骚扰、迫害或拘留。

本文旨在纪念 11 月 2 日“终止针对记者犯罪不受惩罚现象国际日”。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 2020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关于记者安全和有罪不罚问题提交的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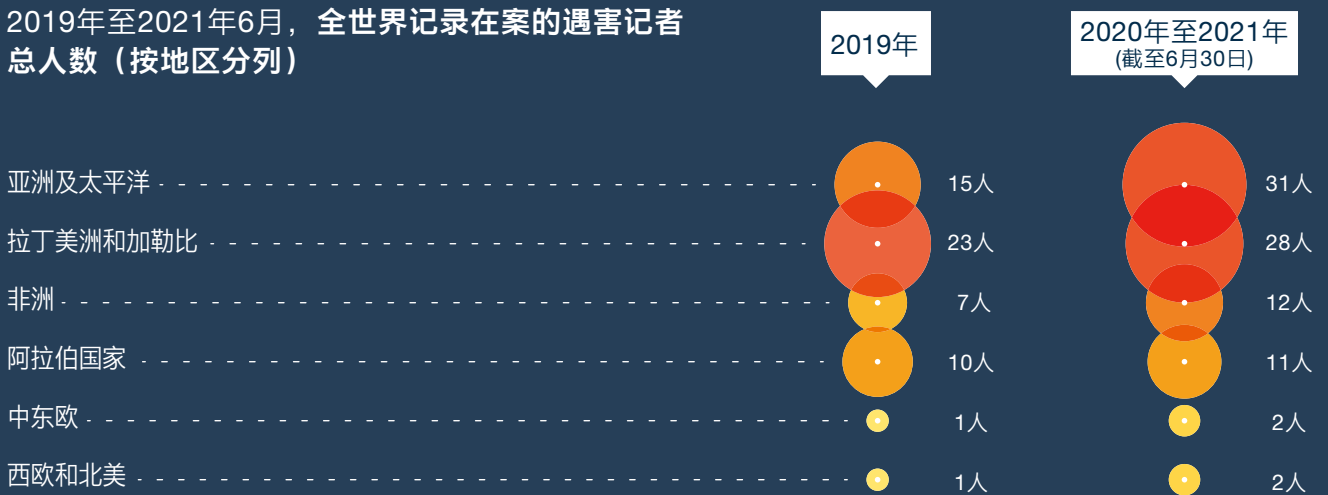
全世界遇害记者人数

2006年至2021年6月遇害记者人数



记者在哪些地区面临的风险最大？

2019年至2021年6月，全世界记录在案的遇害记者总人数（按地区分列）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202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关于记者安全和有罪不罚问题提交的报告》

2018年至2019年，记录在案的遇害记者人数（按国家分列）



资料来源：202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关于记者安全和有罪不罚问题提交的报告》。

谁在什么情况下遇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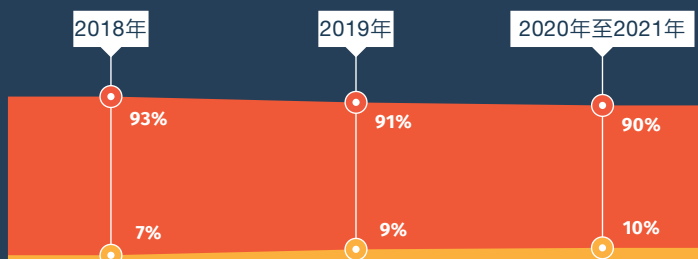
2018年至2021年遇害记者的性别比例
(截至6月30日)



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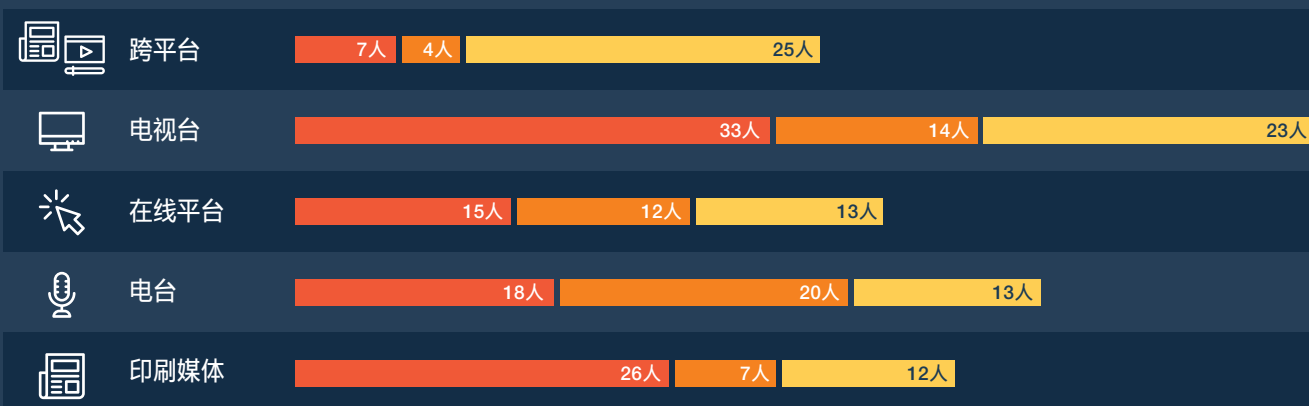


女



2018年至2021年6月遇害记者人数
(按媒体类型分列)

2018年 2019年 2020年至202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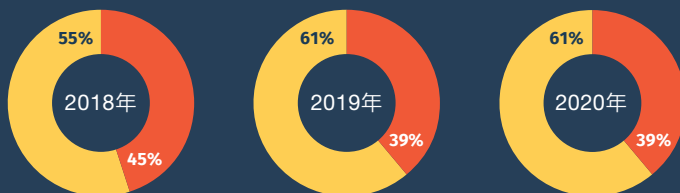
2018年至2020年，在正经历武装冲突的国家遇害的记者人数与在其他国家遇害的记者人数的比例



有武装冲突



无武装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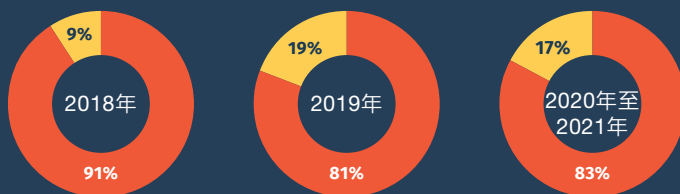
2018年至2021年6月，遇害的受雇记者与自由记者比例



受雇记者



自由记者



2018年至2021年6月，全世界范围内在本国遇害和在外国遇害的记者人数



在本国遇害



在外国遇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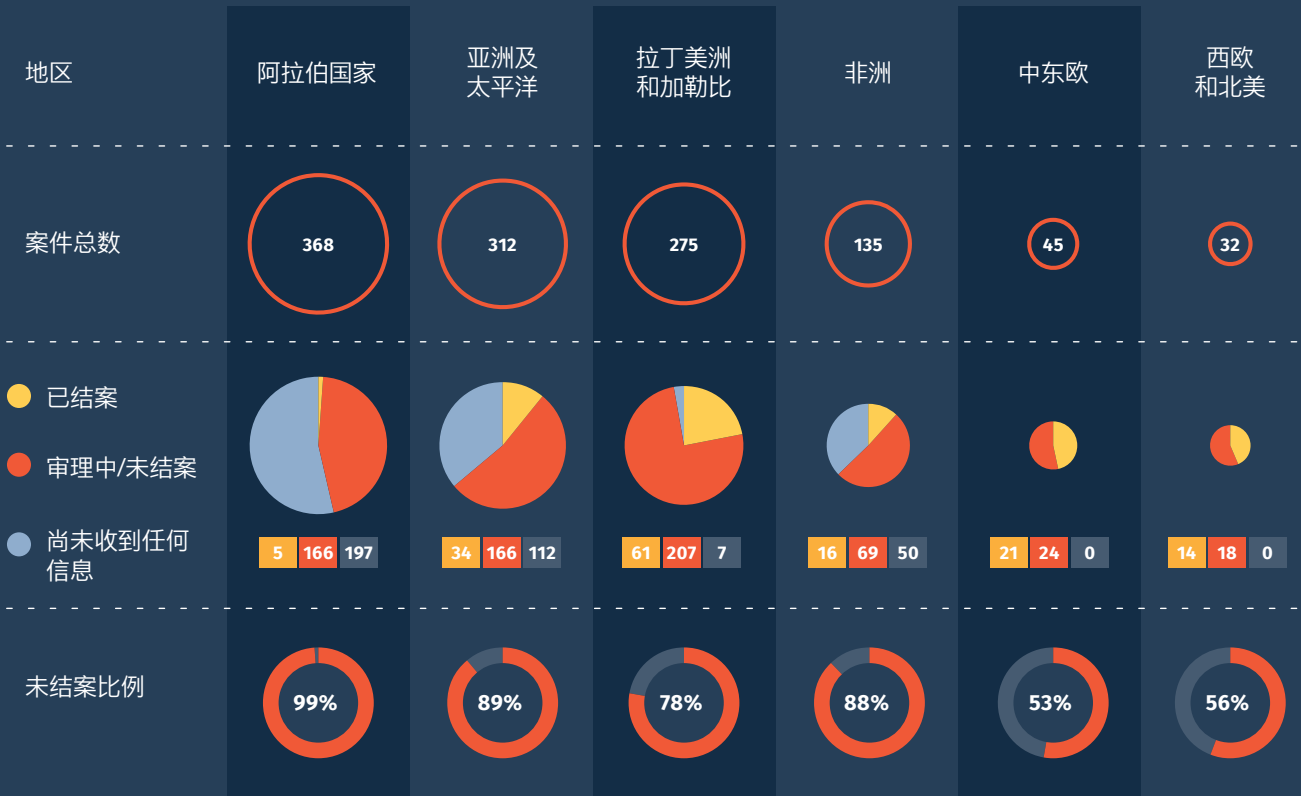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202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关于记者安全和有罪不罚问题提交的报告》。

其法律后果是什么？

2006年至2019年，记者遇害事件调查情况比例



2006年至2019年，不同地区对记者遇害事件开展司法调查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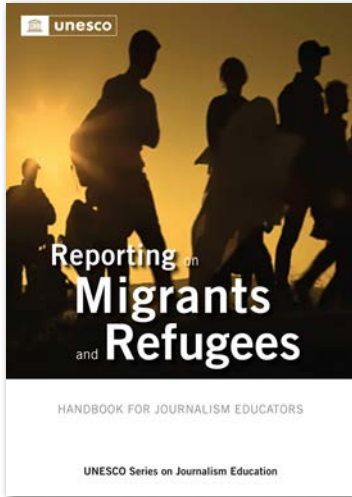


妇女与网络暴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1年讨论文件《不寒而栗：针对女性记者的网络暴力全球趋势》包含一项调查，参与调查的901名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其中714*人为妇女）中：



新出版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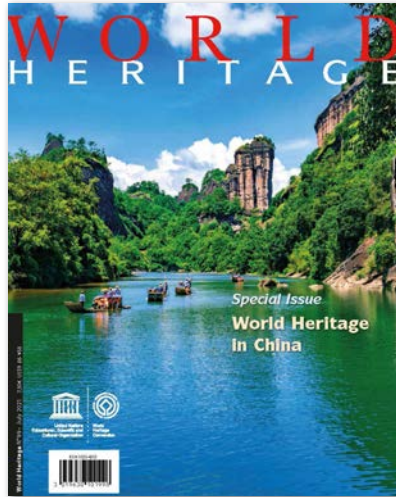


关于移民和难民的报道 新闻教育工作者手册

ISBN 978-92-3-100456-8 (英文版)
304 页, 210mm x 297 mm, PDF 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
可查阅 <https://unesdoc.unesco.org>

该手册旨在使新闻教育工作者能够应对 21 世纪的挑战之一——移民和难民问题。手册共 13 个模块, 为新闻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学习课程, 用于锻炼多种专业能力, 包括关于移民报道的分析、研究、介绍和道德操守。

新闻专业的学生将了解到, 移民和被迫流离失所是与人相关的问题, 因此要做好此类报道必须具备一些知识和认识——准确的事实、可靠的消息来源、有道德操守的报道以及充分的实践。



《世界遗产》, 第 99 期 中国的世界遗产 (特刊)

ISSN 1020-4202 (英文版)
EAN 3059630101967
120 页, 220mm x 280 mm, 平装, 7.50 欧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 / 出版促进发展有限公司

遥感或利用技术远程收集某一地区的信息, 是评估文化遗址遭破坏风险或评估自然区域的常规方式。卫星图像分析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本期中, 我们将学习如何通过与一些机构合作, 让专家们了解哪些遗址遭到了破坏、哪些遗址最需要保护。这些合作机构包括国际自然和文化遗产空间技术中心 (HIST)、欧洲航天局 (ESA) 和联合国训练研究所 (UNITAR) 等。



人工智能与教育 政策制定者指南

ISBN 978-92-3-500039-9
46 页, 210mm x 297 mm, PDF 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
可查阅 <https://unesdoc.unesco.org/>

人工智能 (AI) 有望解决教育正面临的诸多重大挑战, 为教学与学习实践带来创新, 并最终加快步伐, 迈向可持续发展目标 4 的实现。然而, 技术发展如此之迅速, 无疑带来了多重风险和挑战。迄今为止, 风险和挑战出现的速度已远远超过了开展政策讨论和制定监管框架的速度。

该出版物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指导, 说明随着人工智能和教育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 应该如何以最佳方式利用其所带来的机遇, 应对相应的风险。

多种声音, 一个世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杂志不仅以本组织六种官方语言出版, 还以加泰罗尼亚语、世界语、韩语和葡萄牙语出版, 在世界广泛传播。



订阅印刷版本

144元/年(共4期) 288元/两年(共8期)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6层中译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8359101 邮编: 100044

<https://zh.unesco.org/courier/subscribe>

免费订阅电子版本



